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九十七本，第一分
出版日期：民國一一五年三月

考古學視野下橫斷山區與北方地區的早期文化交流

郝曉曉*

橫斷山區地處歐亞大陸東部東、西兩條文化傳播帶的交匯地帶，是青藏高原東麓十分重要的文化和民族走廊。先秦時期，該地區與中國北方及歐亞草原的文化交流頻繁，既是中國邊疆地區古代人群交往和跨區域文化互動歷史的一個縮影，也是古代中國與歐亞草原文明互鑒和人文交流的重要例證。橫斷山區與北方地區的早期文化交流在青銅時代晚期達到高峰，與新石器時代晚期和青銅時代早期相比，這一階段兩地文化交流涉及的空間範圍更廣、內容更豐富、機制更複雜。本文從兵器、工具、生活用具、馬具和葬馬習俗等在橫斷山區與北方青銅文化中都極具代表性的物質文化特徵入手，探討青銅時代晚期兩地文化交流的具體表現、交流機制和歷史背景。本文認為兩地的文化交流是由多條有明確時間和空間指向性的具體聯繫構成的複雜互動網絡，來自東、西不同方向的多元文化在橫斷山區碰撞和融合，造就了當地文化複雜多樣、兼容並蓄的特點。北方文化和遊牧人群的南下，是橫斷山區青銅時代晚期文化形成與發展的關鍵外在動力，其本質是畜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的拉鋸，而在對多元文化因素有選擇性吸收、重組、融合基礎上的變異與創新，則是其內在動力。該過程揭示了橫斷山區因其通道位置而導致當地文化突出的融合性特徵。

關鍵詞：橫斷山區　北方地區　文化交融　互動網絡　畜牧文化

*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

壹・前言

橫斷山區地處中國西南地區，地理範圍大致包括岷江上游至怒江中游地區，即今川西北至滇西一帶（圖 1）。該區域內多條河谷南北縱橫，自史前時期以來就是青藏高原東麓文化交流、物種傳播和人群遷徙的天然通道，民族學上稱之為藏彝走廊。[1] 橫斷山區地處歐亞大陸東部東、西兩條文化傳播帶的交匯地帶，[2] 東西文化在此交匯交融，造就了當地先秦文化複雜多樣、兼容並蓄、多元融合的特徵。與多元文化相對應，該地區先秦時期的族群眾多，他們既有各自的聚居區域和文化特質，又形成了跨人群、跨區域的文化傳統，奠定了近代以來該地區多民族大雜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

橫斷山區與青藏高原東北緣的甘青地區毗鄰，並經甘青地區與新疆至東北的中國北方廣大地區以及更北的歐亞草原溝通。橫斷山區與中國北方地區基本分布在中國第二級階梯內，自然地理環境較接近，地貌以高原、山地和山間盆地為主。橫斷山區北部與甘青地區以東的北方地區的植被以草原和草甸為特徵，橫斷山區南部、冀北山地等地森林發育較好；甘青地區及其以西的北方地區為荒漠地帶，局部也有森林和草甸分布。[3] 橫斷山區與中國北方的多個亞區都處於不同地理單元的過渡地帶，人類活動受環境變遷的影響顯著，同時這些地區也容易形成文化交流的天然廊道。橫斷山區與中國北方地區的自然條件不適宜大規模農耕但擁有豐富的草場資源，處於歷史上的農牧交錯地帶，兩地的部分人群及其以西、以北地區的人群多以畜牧或遊牧為生，而其以南、以東地區則是傳統農耕區，當地人群自新石器時代以來就以農業為生。[4] 自然環境和生業經濟的相似性造就了兩地居民在生活習慣、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共性特徵。[5] 整體而言，橫斷山區與中國東部農耕區的文化和人群區分較明顯，而與北方地區聯繫密切。

---

[1] 費孝通，〈關於我國民族的識別問題〉，《中國社會科學》1980 年 1 期：147-162；石碩主編，《藏彝走廊：歷史與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段渝，〈藏彝走廊與絲綢之路〉，《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 年 2 期：1-5。

[2] 涼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館、涼山彝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一個考古學文化交匯區的發現——涼山考古四十年》（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頁 507-592。

[3] 中國科學院中國自然地理編輯委員會，《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北京：科學出版社，1982），頁 19-25。

[4] 趙志軍，〈新石器時代植物考古與農業起源研究〉，《中國農史》2020 年 3 期：3-13；趙志軍，〈新石器時代植物考古與農業起源研究（續）〉，《中國農史》2020 年 4 期：3-9。

[5] 童恩正，〈試論我國從東北至西南的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文物出版社編輯部編，《文物與考古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頁 17-43。

先秦時期橫斷山區與北方地區的文化和族群眾多，交往密切，但鮮少見於文獻記載，考古學成為重建這段歷史的重要途徑。考古資料揭示出，自新石器時代晚期以來，北方文化和人群的持續南下，是推動橫斷山區及中國西南其他地區，乃至大陸東南亞地區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的最大外在動力。[6] 橫斷山區與北方地區的早期文化交流具有鮮明的階段性特徵，但始終以北方地區對橫斷山區的單向影響為主導。

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約距今 5500-3600 年），甘青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和農業人群的持續南下，極大推動了橫斷山區的新石器化和農業化進程。[7] 其中，甘肅東南部的大地灣四期早段一類遺存，在距今 5500-5300 年南下進入橫斷山區北段的岷江上游和大渡河上游地區，在其影響下當地形成了波西一期遺存。[8] 距今 5300-4500 年，甘青地區的馬家窯文化向南擴張，泥質陶、繩紋、高領罐、弧腹缽和粟黍農業（可能還有稻）等文化特徵，作為一個文化包裹傳播至橫斷山區東部，並與當地文化融合形成了營盤山文化、麥坪文化和皈家堡一期文化。[9] 距今 5000 年以降，甘青地區的半山文化和馬廠文化也相繼南下，影響了卡若文化和金沙江中游新石器文化圈的形成，它們以刻劃紋、戳印紋為特徵的陶器紋飾，可能是對甘青地區彩陶紋飾的改造和變異。[10] 距今 4500-3600 年，甘青地區的齊家文化南下影響了橫斷山區，在岷江上游至雅礱江下游地區發現齊家文化因素。[11] 氣候變化是甘青地區文化和人群持續南下的重要動因，距今5500年前後和距今4000年左右的降溫及其帶來的乾旱，可能引起了甘青地區農業減產、人地矛盾激化等

---

[6] Charles Higham, "Language and Farming Dispersals: Austroasiatic Language and Rice Cultivation," in *Examining the Farming/Language Dispersal Hypothesis*, ed. Peter Bellwood and Colin Renfrew (Cambridge: 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02), pp. 223-232；周志清，〈橫斷山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的互動——兼論西南絲綢之路形成的史前基礎與文化交流〉，《中華文化論壇》2021 年 3 期：15-25。

[7] 陳葦，《先秦時期的青藏高原東麓》（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頁 293-324；鄧振華，〈粟黍的起源與早期南傳〉，《中國社會科學報》2019.06.14，第 5 版。

[8] 陳劍，〈波西、營盤山及沙烏都——淺析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演變的階段性〉，《考古與文物》2007 年 5 期：65-70。

[9] 周志清，〈橫斷山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的互動〉，頁 15-25。

[10] 王仁湘，〈西南地區史前陶器襯花工藝探討〉，《四川文物》2008 年 1 期：33-40。

[11] 杜戰偉、李奎，〈禮州晚段遺存相關問題研究〉，《江漢考古》2019 年 4 期：61-69, 46。

問題，[12] 促使一些人向南遷徙到地理位置臨近但緯度相對較低、環境相對適宜的橫斷山區。此外，以甘青地區為媒介，橫斷山區可能與北方其他地區建立了聯繫，其中橫斷山區中段發現的石圍圈石棺墓與新疆北部阿勒泰地區的石圍圈墓具有相似性，[13] 橫斷山區常見的磨製半月形穿孔石刀和底部內凹的石箭鏃，則與東北地區的同類器相似。新石器時代橫斷山區與甘青地區通道的暢通，及其與中國北方其他地區的潛在聯繫，為青銅時代西南地區與北方地區廣泛、頻繁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礎。

橫斷山區青銅時代早期文化（約距今 3500-2700 年）受到北方青銅文化的影響，除甘青地區外，[14] 其與中國北方其他地區和歐亞草原的聯繫顯著加強。[15] 橫斷山區青銅時代早期文化以帶耳罐和豆為代表的陶器特徵，受到齊家文化、寺窪文化等甘青地區青銅文化的影響，斧、刀、有銎戈等青銅器也顯示出來自中國西北地區的影響。[16] 此外，歐亞草原以廣泛使用石範、工具、裝飾品和兵器為特徵的青銅技術傳統，經西北地區傳入橫斷山區，成為中國西南地區青銅時代開始的標誌。[17] 大麥、小麥（可能還有綿羊）等西方馴化物種也經西北地區傳入橫斷山區。[18] 距今 4000 年前後的全球性降溫事件，對北方青銅文化的發展及其與橫斷

---

[12] 吳文祥、周揚、胡瑩，〈甘青地區全新世環境變遷與新石器文化興衰〉，《中原文物》2009 年 4 期：31-37。

[13] 李萬濤，〈論青藏高原東南麓新發現的石圍石棺墓〉，《西藏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 年 6 期：130-135。

[14] 羅二虎，《文化與生態、社會、族群：川滇青藏民族走廊石棺葬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頁 259-274。

[15] 霍巍，〈論橫斷山區地帶先秦兩漢時期考古學文化的交流與互動〉，《藏學學刊》第 2 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頁 155-169；江章華，〈對鹽源盆地青銅文化的幾點認識〉，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成都考古研究・一》（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頁 404-417。

[16] 宮本一夫，〈中國西南地區川藏高原、洱海系青銅器的變化〉，《南方民族考古》第25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22），頁 223-244。

[17] 周志清，〈中國西南早期青銅時代芻議〉，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成都考古研究・三》（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頁 127-145。

[18] Jade D'Alpoim Guedes, Hongliang Lu, Anke M. Hein, and Amada H. Schmidt, "Early Evidence for the Use of Wheat and Barley as Staple Crops on the Margins of the Tibetan Plateau," *PNAS* 112.18 (2015): 5625-5630; Juan Wang, *A Zooarchaeological Study of the Haimenkou Site, Yunnan Province, China* (Oxford: BAR Publishing, 2018), pp.116-118; Yining Xue, Rita Dal Martello, Ling Qin, Chris J. Stevens, Rui Min, and Dorian Q. Fuller, "Post-Neolithic Broadening of

山區的互動關係產生了顯著影響。距今 4000-3600 年，氣候由暖濕轉為乾冷。[19] 隨著氣溫的下降和降水的減少，中國北方地區的植被由森林轉變為草原森林和草原，該地區與歐亞草原在全新世大暖期（約距今 8000-5000 年）被森林阻斷的通道得以開通，相對乾燥的環境地帶的擴張導致了距今 4000 年以後北方畜牧文化的出現。[20] 乾冷氣候還導致粟黍減產，單一農業的風險提高，一些地區的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21] 人口增長與食物短缺的矛盾激化。這一方面加速了中國西部地區人群的遷徙，另一方面也迫使他們更積極地接納外來作物。[22] 與粟黍相比，麥類作物具有更強的生態適應性，它們所需熱量更低，耐低溫，抗霜凍，產量高，在乾冷氣候條件下是重要的食物補充，它們對人類向高緯度和高海拔地區的擴散也至關重要。[23] 麥類作物率先被引進至新疆和甘青地區，在距今 3600 年之後成為甘青地區的主要農作物之一，支撐了該地區以畜牧經濟為特點的多元青銅文化

Agriculture in Yunnan, China: Archaeobotanical Evidence from Haimenkou,"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Asia* 30 (2022), https://doi.org/10.1016/j.ara.2022.100364.

[19] Harvey Weiss and Raymond S. Bradley, "What Drives Societal Collapse?" *Science* 291.5504 (2001): 609-610; Chengbang An, Lingyu Tang, Loukas Barton, and Fahu Chen, "Climate Change and Cultural Response Around 4000 cal yr B.P. in the Western Part of Chinese Loess Plateau," *Quaternary Research* 63 (2005): 347-352; Yan Zhao and Zicheng Yu, "Vegetation Response to Holocene Climate Change in East Asian Monsoon-Margin Region," *Earth-Science Reviews* 113 (2012): 1-10.

[20] 黃銘崇，〈畜牧者與農耕者之間——早期鄂爾多斯文化群與商文明〉，李永迪主編，《「周邊」與「中心」：殷墟時期安陽及安陽以外地區的考古發現與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5），頁 23-98。

[21] 水濤，〈論甘青地區青銅時代文化和經濟形態轉變與環境變化的關係〉，《環境考古研究》第 2 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頁 65-71。

[22] Xinyi Liu, Emma Lightfoot, Tamsin C. O'Connell, Hui Wang, Shuicheng Li, Liping Zhou, Yaowu Hu, Giedre Motuzaite-Matuzeviciute, and Martin K. Jones, "From Necessity to Choice: Dietary Revolutions in West China in the Second Millennium BC," *World Archaeology* 46.5 (2014): 661-680.

[23] Jade D'Alpoim Guedes and Ethan E. Butler, "Modeling Constraints on the Spread of Agriculture to Southwest China with Thermal Niche Models,"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349 (2014): 29-41; Fahu Chen, Guanghui Dong, Donglin Zhang, Xinyi Liu, Xin Jia, Chengbang An, Minmin Ma, Yaowen Xie, Loukas Barton, Xiaoyan Ren, Zhijun Zhao, Xiaohong Wu, and Martin K. Jones, "Agriculture Facilitated Permanent Human Occupation of the Tibetan Plateau After 3600 B.P.," *Science* 347.6219 (2015): 248-250; Jade D'Alpoim Guedes, "Rethinking the Spread of Agriculture to the Tibetan Plateau," *The Holocene* 25.9 (2015): 1498-1510.

的發展。[24] 麥類作物製作的麵食具有方便攜帶、易於儲存的優點，這與北方畜牧經濟的發展相契合，加速了人群的移動。在橫斷山區，氣候惡化及其引起的生存危機，導致了距今 3700 年前後新石器時代聚落的大規模衰落，聚落數量急劇減少，分布範圍局限在緯度和海拔相對較低、自然條件相對較好的金沙江中游及其以南地區。在之後的兩百餘年間，橫斷山區本土文化發展緩慢，這是北方青銅文化能夠快速進入該地區的原因之一。距今 3400 年前後，麥類作物隨北方人群的南下傳播至橫斷山區，其最先出現在個別海拔相對較高的地區，並逐漸成為這些地區的主要農作物，[25] 當地農業生產的多元化實踐，增強了生業經濟的穩定性，推動了人群向更高海拔地區的探索，這是青銅時代早期橫斷山區文化復蘇、新聚落興起的重要基礎。

青銅時代晚期（約距今 2700-2100 年）是橫斷山區青銅文化發展的繁盛期，此時橫斷山區與北方地區的文化交流和人群互動更為頻繁，涉及的區域更廣、內容更豐富、機制更複雜，兩地文化交流達到高峰。短刀、短劍、管銎器等在北方青銅文化早期已經普遍使用的銅器，以及動物紋等裝飾特徵，在這一階段隨北方人群的南下帶入橫斷山區，隨之而來的還有北方青銅文化晚期流行的銅馬具和葬馬習俗等文化因素，它們深刻影響了橫斷山區各族群的生產生活。這些非容器類銅器的廣泛使用，是青銅時代橫斷山區與北方地區的共性特徵，它們輕便易攜，既支持了北方草原地帶的生活所需，也與橫斷山區畜牧業的發展相適應。這些器物常發現於墓葬中，它們與葬馬等習俗一起，既是兩地人群生活方式的反映，也是他們文化傳統和喪葬觀念的體現。距今 2800-2700 年前後的氣候乾冷事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北方人群向南遷徙。[26] 此外，北方地區在青銅時代早期已經

[24] Minmin Ma, Guanghui Dong, Xin Jia, Hui Wang, Yifu Cui, and Fahu Chen, “Dietary Shift After 3600 cal yr BP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Northwestern China: Evidence from Stable Isotopes,”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145 (2016): 57-70.

[25] D’Alpoim Guedes et al., “Early Evidence for the Use of Wheat and Barley as Staple Crops on the Margins of the Tibetan Plateau,” pp. 5625-5630; Xue et al., “Post-Neolithic Broadening of Agriculture in Yunnan, China.”

[26] 葛全勝主編，《中國歷朝氣候變化》（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頁 33；徐佳佳，〈成都平原中晚全新世典型遺址環境考古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地理與海洋科學學院博士論文，2017），頁 6-8。

養馬，馬被用來騎乘或拉車，[27] 這些因素可追溯到更早的歐亞草原西部。[28] 橫斷山區青銅時代晚期人群可能在與北方人群的接觸中學習到了養馬、騎馬、乘車等知識，橫斷山區中段的鹽源盆地發現的大量馬骨、馬具、銅馬車模型以及銅器上的騎馬形象證實了這點。[29] 馬和車的利用增強了人的移動性，加快了文化的流通，這可能是這一階段橫斷山區與北方地區文化交流更加頻繁的重要原因。

本文將聚焦青銅時代晚期橫斷山區與北方地區的文化交流，以兵器、工具、生活用具、馬具等支持生活所需的青銅器和葬馬習俗為切入點，分類比較它們與北方文化的聯繫；在此基礎上，綜合討論器物叢和習俗反映的兩地早期文化交流網絡的形成及其背景等問題，揭示文化和政治邊緣地區古代人群跨區域文化互動的歷史，探索通道地帶的文化特質及其形成機制。

[27] 黃銘崇，〈畜牧者與農耕者之間〉，頁 23-98；黃銘崇，〈也談所謂「勺形器」以及早期鄂爾多斯文化群人們的「武裝化」與「移動化」問題〉，《古今論衡》27（2015）：77-100。

[28] David Anthony and Nikolai Vinogradov, "Birth of the Chariot," *Archaeology* 48.2 (1995): 36-41; Dorcas Brown and David Anthony, "Bit Wear, Horseback Riding and the Botai Site in Kazakstan,"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5 (1998): 331-347; Norbert Benecke and Angela von den Driesch, "Horse Exploitation in the Kazakh Steppes During the Eneolithic and Bronze Age," in *Prehistoric Steppe Adaptation and the Horse*, ed. Marsha Levine, Colin Renfrew, and Katie Boyle (Cambridge: 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03), pp. 69-82; Sandra L. Olsen, "The Exploitation of Horses at Botai, Kazakhstan," in *Prehistoric Steppe Adaptation and the Horse*, ed. Marsha Levine, Colin Renfrew, and Katie Boyle (Cambridge: 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03), pp. 83-104.

[29] 涼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老龍頭墓地與鹽源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頁 8-27, 135, 138；田劍波、周志清、劉靈鶴、孫策，〈四川鹽源老龍頭墓地〉，國家文物局主編，《2022 中國重要考古發現》（北京：文物出版社，2023），頁 53-58；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涼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院、鹽源縣文物管理所，〈四川鹽源縣老龍頭墓地 2020～2024 年的發掘〉，《考古》2025 年 11 期：58-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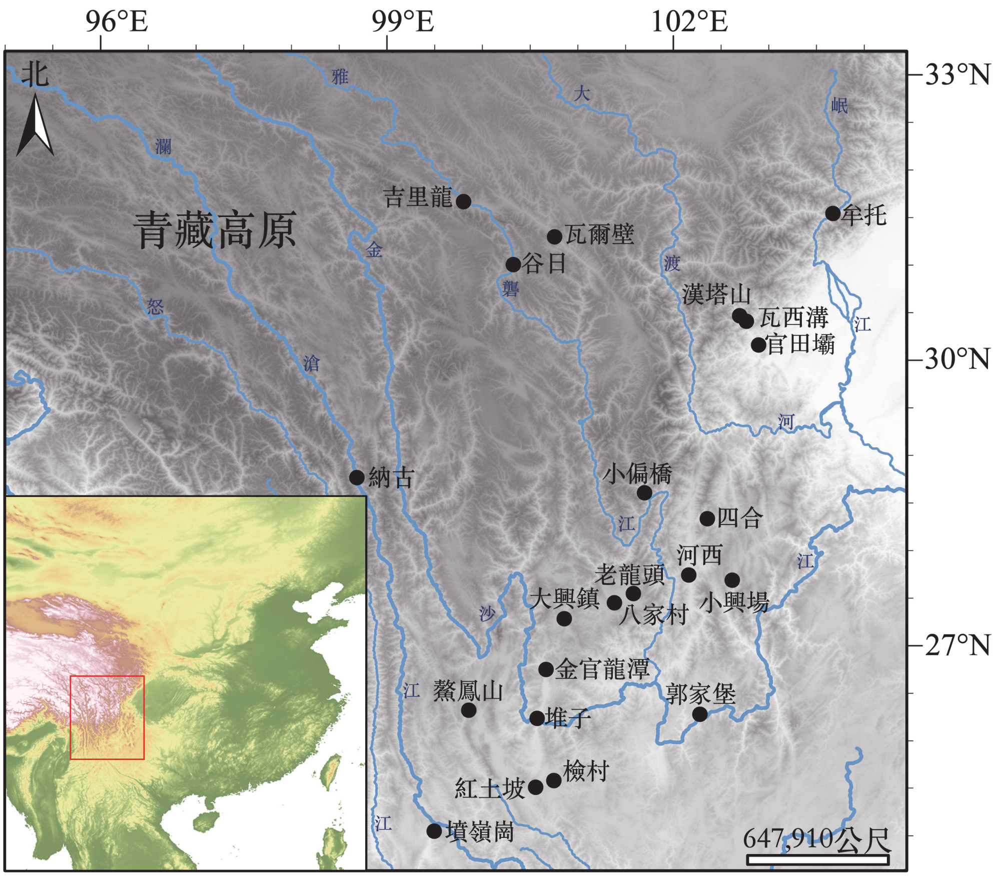

圖 1：橫斷山區位置及文中所提主要遺址[30]

---

[30] 位置訊息參考西昌地區博物館，〈西昌河西大石墓群〉，《考古》1978 年 2 期：91（圖 1）；涼山彝族地區考古隊，〈四川涼山喜德拉克公社大石墓〉，《考古》1978 年 2 期：97（無圖）；寶興縣文化館，〈四川寶興縣漢代石棺墓〉，《考古》1982 年 4 期：377（圖 1）；雲南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雲南德欽縣納古石棺墓〉，《考古》1983 年 3 期：220（圖 1）；雲南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雲南寧蒗縣大興鎮古墓葬〉，《考古》1983 年 3 期：226（圖 1）；大理州文物管理所、祥雲縣文化館，〈雲南祥雲檢村石槨墓〉，《文物》1983 年 5 期：33（無圖）；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館，〈四川甘孜縣吉里龍古墓葬〉，《考古》1986 年 1 期：28（圖 1）；雲南省博物館保管部，〈雲南永勝金官龍潭出土青銅器〉，《雲南文物》19（1986）：4（無圖）；格勒，〈新龍谷日的石棺葬及其族屬問題〉，《四川文物》1987 年 3 期：11（圖 1）；涼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館、普格縣文化館，〈四川普格小興場大石墓群的調查與清理〉，《文物資料叢刊》10（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頁 155（圖 1）；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劍川鰲鳳

貳・短兵相交：兵器所見多元文化交融

隨葬銅兵器是橫斷山區與北方地區青銅時代的典型葬俗之一，兩地出土的一些銅兵器聯繫密切。橫斷山區出土短劍、鉞、戈、矛、箭鏃等銅兵器，以短劍最常見，數量多、類型多樣。其中山字格劍在橫斷山區分布廣泛，其使用貫穿整個青銅時代晚期，此類器物可能是從甘寧地區多次傳入的，新疆和米努辛斯克盆地發現有更早的祖型。[31] 雙圓餅首劍、馬鞍形首劍等其他類型的短劍在橫斷山區發現相對較少，它們也帶有鮮明的北方草原文化風格。

雙圓餅首短劍在橫斷山區分布於南部的金沙江中游地區，以川西南的鹽源盆

山古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90 年 2 期：239（圖 1）；郭鳳武，〈蘆山思延鄉戰國墓清理報告〉，《四川文物》1994 年 5 期：76（無圖）；四川省文管會、雅安地區文化館、寶興縣文管所，〈四川寶興漢塔山戰國土坑積石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99 年 3 期：337（圖 1）；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雲南昌寧墳嶺崗青銅時代墓地〉，《文物》2005 年 8 期：4（圖 1）；涼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老龍頭墓地與鹽源青銅器》，頁 2（圖 1）；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勝堆子遺址〉，雲南考古（http://www.ynkgs.cn/view/ynkgPC/1/134/view/1280.html，2010.05.13）；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會理縣文物管理所、四川大學考古系、涼山州博物館，〈2009 年度會理縣新發鄉考古調查簡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成都考古發現 2008》（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頁 213（圖 1）；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館，〈雲南祥雲紅土坡 14 號墓清理簡報〉，《文物》2011 年 1 期：4（無圖）；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九龍縣文化旅遊局，〈九龍縣烏拉溪鄉石棺葬墓調查清理簡報〉，《四川文物》2011 年 1 期：25（圖 1）；茂縣羌族博物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茂縣牟托一號石棺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頁 2（圖 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爐霍縣文物管理所，〈四川爐霍縣斯木鄉瓦爾壁 M1 發掘簡報〉，《四川文物》2014 年 5 期：10（圖 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涼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館、鹽源縣文物管理所，〈四川鹽源縣八家村西漢墓葬發掘簡報〉，《四川文物》2021 年 3 期：4（圖 1）。

31 童恩正，〈我國西南地區青銅劍的研究〉，《考古學報》1977 年 2 期：35-55；宋治民，〈三叉格銅柄鐵劍及相關問題的探討〉，《考古》1997 年 12 期：50-58；楊建華，〈三叉式護手劍與中國西部文化交流的過程〉，《考古》2010 年 4 期：71-78；宮本一夫，〈中國西南地區川藏高原、洱海系青銅器的變化〉，頁 223-244。

地發現最多，[32] 滇西北的寧蒗大興鎮、[33] 劍川鰲鳳山、[34] 德欽納古、[35] 永勝金官龍潭[36] 也有發現，年代約在公元前 8 至前 2 世紀。一般認為此類器物受到了中國北方雙環首短劍的影響。[37] 具體而言，其整體形態與冀北山地的雙圓餅首短劍更接近。[38] 此類器物以雙圓餅狀的劍首為基本特徵，雙圓餅上常飾同心圓紋，多為扁長方形莖，這些特徵明顯受到了約公元前 8 至前 4 世紀冀北山地流行的雙圓餅首短劍的影響，[39] 其飾同心圓紋的雙圓餅首應是對冀北山地羊角或羊目狀雙圓餅首的簡化，其無劍格而是在劍身基部飾紋的特徵也有別於冀北山地的同類器（圖 2：1, 4-6）。此外，大興鎮採集的一件雙圓餅首短劍（採 01），在冀北山地雙圓餅首短劍的基礎上吸收了約公元前 9 至前 7 世紀內蒙古東南部銅刀的鏤空扭

[32] 涼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老龍頭墓地與鹽源青銅器》。本文涉及四川鹽源老龍頭墓地前三次發掘（M1-M11）和鹽源採集青銅器的相關材料均引自該文獻。老龍頭墓地 2020-2024 年第四次發掘的資料由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老龍頭墓地與鹽源青銅器》的編寫者認為鹽源青銅文化的年代約在公元前 5 至前 1 世紀，鹽源盆地2020 年以前發現的雙圓餅首短劍均係採集，無共存器物，其年代應在鹽源青銅文化的年代範圍內，但具體年代不明確。老龍頭墓地 2020-2024 年發掘的一些墓葬有出土雙圓餅首短劍，其莖部一般為扁長方形。這些墓葬中一些有直接測年，據此可知鹽源盆地雙圓餅首短劍的年代上限可至公元前 8 至前 5 世紀，如 M552 出土人骨的 C^{14} 測年為 2470±30 BP，樹輪校正年代為 766-422 BC（95.4%），M859 出土人骨的 C^{14} 測年為 2480±30 BP，樹輪校正年代為 772-478 BC（95.4%）。其他一些出土雙圓餅首短劍的墓葬雖無直接測年，但通過其墓葬形制、器物組合與另一些具有直接測年的墓葬的對比，推測部分墓葬的年代約在公元前 5 至前 2 世紀。老龍頭墓地 2020-2024 年的發掘揭示出鹽源青銅文化的年代上限遠比此前所認為的要早，年代約在公元前 11 至前 8 世紀的石範、鼓風管等與冶鑄相關的器物的發現，反映出青銅時代早期當地可能已進行銅器冶鑄活動，至公元前 8 世紀以後，墓葬中普遍隨葬青銅器。

[33] 雲南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雲南寧蒗縣大興鎮古墓葬〉，頁 226-232。

[34] 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劍川鰲鳳山古墓發掘報告〉，頁 239-265。

[35] 雲南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雲南德欽縣納古石棺墓〉，頁 220-225。

[36] 雲南省博物館保管部，〈雲南永勝金官龍潭出土青銅器〉，頁 4-25；童恩正，〈我國西南地區青銅劍的研究〉，頁 35-55。

[37] 張增祺，〈雲南青銅時代的「動物紋」牌飾及北方草原文化遺物〉，《考古》1987 年 9 期：808-820；霍巍，〈試論西藏及西南地區出土的雙圓餅形劍首青銅短劍〉，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編，《慶祝張忠培先生七十歲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頁 437-447。

[38] 郝曉曉，〈橫斷山區出土「雙圓餅首」與「T 形莖首」青銅短劍研究〉，《考古》2021 年 10 期：76-86。

[39]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軍都山墓地——玉皇廟》（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本文涉及玉皇廟墓地的材料均引自該文獻。

辮狀莖的特徵（圖 2：3, 8）；[40] 鹽源採集的一件雙圓餅首短劍（C:227），則在冀北山地雙圓餅首短劍的基礎上，融合了同時期寧夏固原地區短劍的雙柄式莖和山字形格的特徵（圖 2：2, 7）。[41] 因此，橫斷山區的雙圓餅首短劍整體受到了冀北山地雙圓餅首短劍的影響，並有所簡化和變異，少數器物在冀北山地雙圓餅首短劍的基礎上，融合了中國北方地區中、東部的其他文化因素。橫斷山區出土雙圓餅首短劍的年代跨度較大，它們應有早晚之分，但由於這些器物多為缺少層位關係和器物組合關係的採集品，目前尚無法確定它們的演變序列和具體年代。結合北方地區相關器物的年代，推測大興鎮採集扭辮狀莖短劍的年代可能早至約公元前 8 至前 7 世紀，而鹽源採集雙柄式莖短劍的年代可能在公元前 7 至前 4 世紀，[42] 這說明冀北山地向橫斷山區的文化流動不是一次實現的而是多次發生的。

馬鞍形首短劍在大渡河中游至金沙江中游北岸有少量發現，年代集中在公元前 3 至前 1 世紀。此類器物的典型特徵是首部歧出呈馬鞍形，類似器物在中國北方鮮少發現，但其劍首形態與中亞草原地區常見的羊角形首短劍相似，均為歧出的角狀。其中帕米爾地區出土羊角形首短劍年代相對較早，約在公元前 8 至前 6 世紀。[43] 哈薩克斯坦中、東部地區的羊角形首短劍年代略晚，約在公元前 6 至前 3 世紀。[44] 新疆鄯善縣蘇貝希二號墓地、[45] 伊吾縣托背梁 M3[46] 也有出土類似的銅質或鐵質短劍，年代約在公元前 5 至前 1 世紀。橫斷山區馬鞍形首短劍的劍首形態可能受到中亞草原和新疆地區羊角形首短劍的影響。

---

[40] 遼寧省昭烏達盟文物工作站、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東北工作隊，〈寧城縣南山根的石槨墓〉，《考古學報》1973 年 2 期：27-39, 148-159。

[41] 寧夏固原地區雙柄式劍的年代約在公元前 7 至前 3 世紀，同時期該地區也常見山字格劍。參見楊寧國、祁悅章，〈寧夏彭陽縣近年出土的北方系青銅器〉，《考古》1999 年 12 期：28-37；楊建華，〈三叉式護手劍與中國西部文化交流的過程〉，頁 71-78。

[42] 鹽源採集短劍 C:227，其雙圓餅狀劍首與約公元前 8 至前 4 世紀冀北山地同類短劍的劍首特徵接近，其雙柄式莖與約公元前 7 至前 3 世紀寧夏固原地區一些短劍的特徵一致，綜合這兩個特徵在北方地區的流行年代，推測鹽源 C:227 的年代約在公元前 7 至前 4 世紀。參見楊寧國、祁悅章，〈寧夏彭陽縣近年出土的北方系青銅器〉，頁 28-37；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軍都山墓地——玉皇廟》，頁 915-960。

[43] 張盟，〈公元前 1 千紀的內陸亞洲山麓通道〉（長春：吉林大學文學院博士論文，2013），頁 31-34。

[44] 楊建華、邵會秋、潘玲，《歐亞草原東部的金屬之路：絲綢之路與匈奴聯盟的孕育過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頁 294-302。

[45] 吐魯番地區文管所，〈新疆鄯善縣蘇巴什古墓群的新發現〉，《考古》1988 年 6 期：502-506。

[46] 西北大學文化遺產保護與考古學研究中心、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地區文物局，〈2009 年新疆伊吾縣托背梁墓地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4 年 4 期：24-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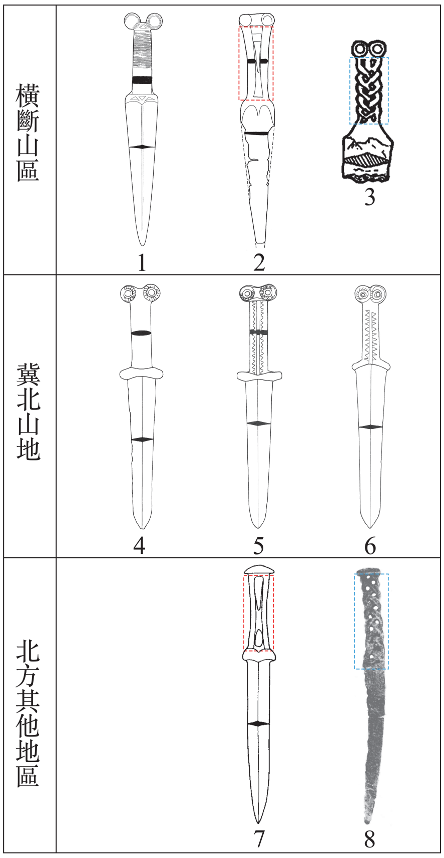

圖 2：橫斷山區雙圓餅首銅短劍與北方地區相關銅器比較

1-2. 四川鹽源 C:46、C:227[47]；3. 雲南大興鎮採 01[48]；4-6. 北京玉皇廟 YYM57:2、YYM179:2、[49] YYM22:2[50]；7. 寧夏莨麻村 XM:02[51]；8. 內蒙古南山根 M101:53[52]（8 為刀，其餘為短劍）

---

47 鹽源 C:46、C:227 來自涼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老龍頭墓地與鹽源青銅器》，頁 70（圖 44）。

48 雲南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雲南寧蒗縣大興鎮古墓葬〉，頁 228（圖 5）。

49 玉皇廟 YYM57:2、YYM179:2 來自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軍都山墓地——玉皇廟》，頁 919（圖 576）。

50 玉皇廟 YYM22:2 來自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軍都山墓地——玉皇廟》，頁 916（圖 574）。

51 楊寧國、祁悅章，〈寧夏彭陽縣近年出土的北方系青銅器〉，頁 33（圖 4）。

52 遼寧省昭烏達盟文物工作站、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東北工作隊，〈寧城縣南山根的石槨墓〉，頁 156（圖版 9）。

橫斷山區出土馬鞍形首短劍的劍柄形態有直柄和曲柄之分，它們可能有不同的文化淵源。其中四川西昌河西、[53] 會理郭家堡[54] 的馬鞍形首短劍為直柄，與中亞草原和新疆地區的羊角形首短劍的劍柄特徵接近，它們可能整體仿製於羊角形首短劍但有所變異（圖 3：1, 3-5）。而四川寶興瓦西溝 M2、[55] 鹽源老龍頭 M11、雲南永勝金官龍潭的馬鞍形首短劍為曲柄（圖 3：2），它們可能融合了羊角形首短劍和中國北方地區曲柄短劍的特徵。曲柄短劍是約公元前 13 至前 10 世紀流行於中國北方地區的一類短劍，[56] 在今北京北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陝西北部、內蒙古東南部和中南部等北方地區中、東部有廣泛發現。[57] 橫斷山區短劍所見曲柄的特徵可能受到北方地區曲柄短劍的影響。[58] 但兩者在年代、器形和鑄造工藝上的差異不容忽視。年代上，北方地區曲柄短劍明顯早於橫斷山區同類器，那麼如何看待兩者數百年的時間間隔呢？有學者對目前橫斷山區青銅文化編年提出了質疑並將該地區曲柄短劍的年代提早至公元前 11 至前 10 世紀，[59] 與北方地區曲柄短劍的年代大致相當。這暗示流行於北方地區的曲柄短劍可能在青銅時代早期已經傳播至橫斷山區，並在當地延續至青銅時代晚期。解決該問題還需以未來更可靠的編年工作為基礎。器形上，北方地區曲柄短劍為鈴首、獸首或環首（圖 3：6），未見馬鞍形首者，橫斷山區僅會理收藏的一件馬頭曲柄短劍與北方地區此類器物接近。[60] 另外，北方地區曲柄短劍的劍柄為扁平型，橫斷山區曲柄馬鞍形首短劍的劍柄分節，中間有箍，有學者認為這種竹節狀劍柄可能受到了西南地區竹子形態的影響。[61] 事實上，遼東及朝鮮半島北部至九州北部發現的約

[53] 西昌地區博物館，〈西昌河西大石墓群〉，頁 91-96。

[54]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09 年度會理縣新發鄉考古調查簡報〉，頁 213-230。

[55] 寶興縣文化館，〈四川寶興縣漢代石棺墓〉，頁 377-380。

[56] 一些學者認為曲柄短劍主要不是作為兵器使用，而是作為生產工具。參見三宅俊彥，〈關於初期曲柄短劍的用途〉，《邊疆考古研究》第 1 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頁 76-80；黃銘崇，〈畜牧者與農耕者之間〉，頁 23-98。

[57] 烏恩，〈關於我國北方的青銅短劍〉，《考古》1978 年 5 期：324-333, 360；鄭紹宗，〈中國北方青銅短劍的分期及形制研究〉，《文物》1984 年 2 期：37-49；烏恩，〈殷至周初的北方青銅器〉，《考古學報》1985 年 2 期：135-156。

[58] 張增祺，〈雲南青銅時代的「動物紋」牌飾及北方草原文化遺物〉，頁 808-820；蘇奎，〈西南夷地區三種含北方系青銅文化因素短劍的研究〉（成都：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論文，2005），頁 21-29。

[59] 宮本一夫，〈中國西南地區川藏高原、洱海系青銅器的變化〉，頁 223-244。

[60] 唐翔，〈會理新近收藏的幾件青銅器〉，《四川文物》1998 年 2 期：16-18。

[61] 蘇奎，〈西南夷地區三種含北方系青銅文化因素短劍的研究〉，頁 26-29。

公元前 4 至前 1 世紀的觸角式短劍的劍柄也有分節的特徵，多分為上下兩節，分界明顯，上與劍首相連，下與劍格相接，[62] 其中韓國大邱市飛山洞的觸角式短劍的劍柄中部也有箍（圖 3：7），[63] 形態與橫斷山區曲柄馬鞍形首短劍的劍柄形態相似。鑄造工藝上，北方地區曲柄短劍的劍首造型突出而複雜，可能經多次澆鑄而成；[64] 橫斷山區曲柄馬鞍形首短劍器形簡單，可能是對範一次鑄成。整體上，橫斷山區的兩類馬鞍形首短劍受到北方青銅文化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其中直柄馬鞍形首短劍受到中亞草原和新疆地區羊角形首短劍的影響，而曲柄馬鞍形首短劍則在西部地區羊角形首短劍的基礎上，融合了中國北方地區中、東部流行的曲柄短劍、觸角式短劍的一些特徵，它們與北方地區相關器物的差異反映出橫斷山區對外來文化因素的融合、改造和創新。

短劍是中國北方和歐亞草原青銅時代至早期鐵器時代廣泛流行的兵器。此類器物體型短小、輕便易攜，普遍有供持握的劍首、扁莖和護手的劍格，有別於公元前 8 至前 3 世紀中原地區流行的柱脊劍、圓莖劍、扁莖無格無首劍，以及四川盆地常見的劍莖穿孔的柳葉形劍。橫斷山區出土短劍整體上受到了中國北方和歐亞草原短劍的影響並有所變異和創新，不同類型短劍的文化來源複雜多樣。其中山字格短劍和直柄馬鞍形首短劍與中國北方地區中、西部的甘寧地區和新疆地區關係密切，並可追溯至歐亞草原中部地區。雙圓餅首短劍是中國北方東部的冀北山地青銅文化沿北方長城地帶向西傳播，並與甘寧等地文化融合的產物。曲柄馬鞍形首短劍則是中國北方地區東、西部多元文化因素的融合。除短劍外，川西高原出土的管銎戈和銎式鏃也是中國北方管銎兵器南傳的產物，後者淵源於歐亞草原的有銎斧和銎式鏃。[65]

---

[62] 張錫瑛，〈試論我國北方和東北地區的「觸角式」劍〉，《考古》1984 年 8 期：744-751, 768。

[63] 宮本一夫，〈東北亞地區觸角式銅劍的變遷〉，《邊疆考古研究》第 1 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頁 81-90。

[64] 黃銘崇，〈畜牧者與農耕者之間〉，頁 45。

[65] 周志清，〈淺析川西南青銅時代的管銎兵器——兼論川西高原在歐亞草原和北方文化傳播帶中的地位〉，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成都考古研究・三》（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頁 146-1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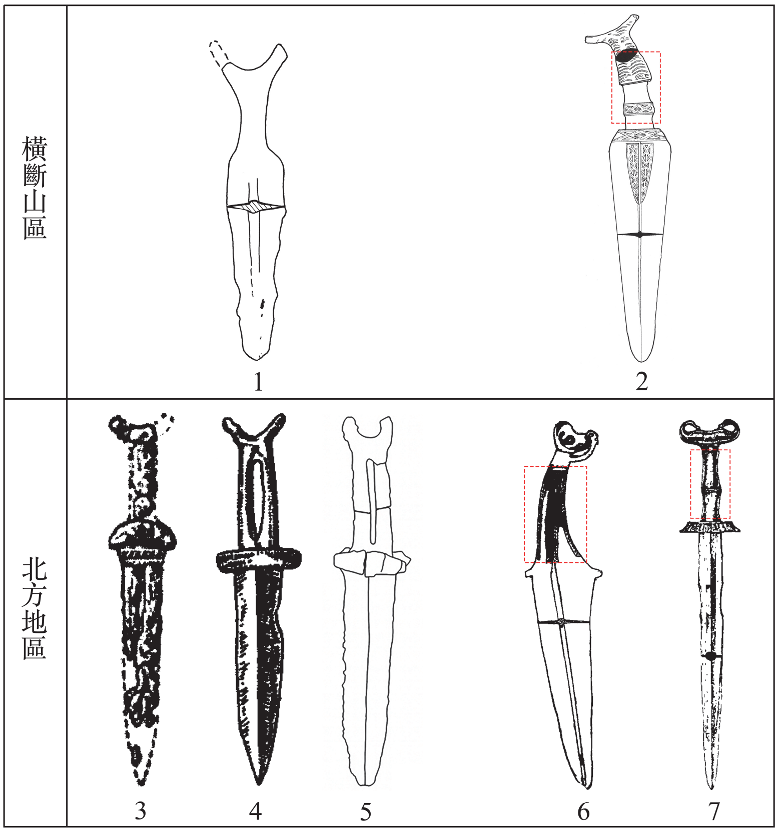

圖 3：橫斷山區馬鞍形首銅短劍與北方地區同類器比較

1. 四川河西 M1:5[66]；2. 四川老龍頭 M11:24[67]；3. 帕米爾地區出土[68]；4. 哈薩克斯坦東部地區出土[69]；5. 新疆托背梁 M3:2[70]；6. 河北抄道溝出土[71]；7. 韓國飛山洞出土[72]

[66] 西昌地區博物館，〈西昌河西大石墓群〉，頁 94（圖 6）。

[67] 涼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老龍頭墓地與鹽源青銅器》，頁 35（圖 24）。

[68] 張盟，〈公元前 1 千紀的內陸亞洲山麓通道〉，頁 147（圖 2.3-2）。

[69] 楊建華等，《歐亞草原東部的金屬之路》，頁 300（圖 5-1-22）。

[70] 西北大學文化遺產保護與考古學研究中心等，〈2009 年新疆伊吾縣托背梁墓地發掘簡報〉，頁 31（圖 18）。

[71] 鄭紹宗，〈中國北方青銅短劍的分期及形制研究〉，頁 44（圖 5）。

[72] 宮本一夫，〈東北亞地區觸角式銅劍的變遷〉，頁 85（圖 5）。

參．刀形重塑：工具所見多元文化交融

橫斷山區與北方地區均出土較多銅工具，並普遍有隨葬銅工具的習俗。其中銅刀是兩地最常見、最典型的銅工具，數量多，分布廣泛，類型多樣。兩地均發現大量環首刀，形制接近。[73] 此外，橫斷山區出土的齒柄舌刀、雙圓餅首刀等類型也與北方青銅文化聯繫密切。

齒柄舌銅刀在橫斷山區主要分布於雅礱江下游地區，以四川鹽源老龍頭墓地出土最多，[74] 四川喜德拉克四合、[75] 普格小興場、[76] 會理[77] 也有少量發現，年代約在公元前 8 至前 1 世紀。此類刀為複合柄式，刀身需與木質或骨質的刀柄綁縛或夾裝以使用，刀身與刀柄之間有柄舌，柄舌的一側或兩側有凸齒，這些凸齒是為便於使用繩索將刀柄與刀身綁縛，柄舌與刀身分界明顯。齒柄舌銅刀是冀北山地、遼西、內蒙古東南部和吉林中部地區青銅時代的典型器物，以遼西和內蒙古東南部發現最多且出現時間早、使用時間長，約從公元前 11 世紀延續至公元前 3 世紀。[78] 橫斷山區出土齒柄舌銅刀與遼西和內蒙古東南部的同類器較為接近。其中老龍頭 M258:2、四合 M6:22 等齒柄舌刀，刀背微弧，斜直刃，與內蒙古寧城南山根 1958 年出土同類器相似（圖 4：1, 4）；[79] 老龍頭 M165:2 等齒柄舌刀，弧背，刃尖較平，與遼寧瀋陽鄭家窪子 M6512 出土同類器相似（圖 4：2, 5）；[80] 老龍頭 M632:9 等齒柄舌刀，弧背，刃尖上翹，與遼寧朝陽木頭溝 M1:4、[81] 小黑石溝 92NDXBIM1:2[82] 等相似（圖 4：3, 6）。儘管冀北山地也有出土齒柄舌銅

[73] 呂學明，〈中國北方地區出土的先秦時期銅刀研究〉（長春：吉林大學文學院博士論文，2008）。在橫斷山區的鹽源盆地和滇西北地區有發現環首銅刀。

[74] 老龍頭墓地的齒柄舌銅刀均出土自 2020-2024 年第四次發掘的墓葬，根據器物特徵推測它們的年代約在公元前 8 至前 1 世紀，其中 M949 出土人骨的 C^{14} 測年為 2520±20 BP，樹輪校正年代為 779-548 BC（95.4%）。

[75] 涼山彝族地區考古隊，〈四川涼山喜德拉克公社大石墓〉，頁 97-103。

[76] 涼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館、普格縣文化館，〈四川普格小興場大石墓群的調查與清理〉，頁 155-158。

[77] 唐翔，〈會理新近收藏的幾件青銅器〉，頁 16-18。

[78] 瑜瓊，〈齒柄式銅刀芻議〉，《北方文物》1991 年 3 期：12-18；呂學明，〈齒柄舌銅刀研究〉，《北方民族考古》第 1 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4），頁 59-74。

[79] 李逸友，〈內蒙昭烏達盟出土的銅器調查〉，《考古》1959 年 6 期：276-277。

[80] 瀋陽故宮博物館、瀋陽市文物管理辦公室，〈瀋陽鄭家窪子的兩座青銅時代墓葬〉，《考古學報》1975 年 1 期：141-156。

[81] 靳楓毅，〈朝陽地區發現的劍柄端加重器及其相關遺物〉，《考古》1983 年 2 期：133-145。

[82]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寧城縣遼中京博物館，《小黑石溝——夏家店上層文化遺址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頁 321。

刀，[83] 其柄舌與刀身的分界不甚明顯，凸齒下端與刃部近平或凸出刃部，有別於橫斷山區的齒柄舌銅刀。此外，甘肅永靖蓮花台黑頭咀 H223 出土一件齒柄舌銅刀，年代約在公元前 11 至前 8 世紀，[84] 它是起源於中國北方地區東部的齒柄舌銅刀向西傳播的重要例證。綜上，橫斷山區的齒柄舌銅刀可能受到了遼西和內蒙古東南部同類器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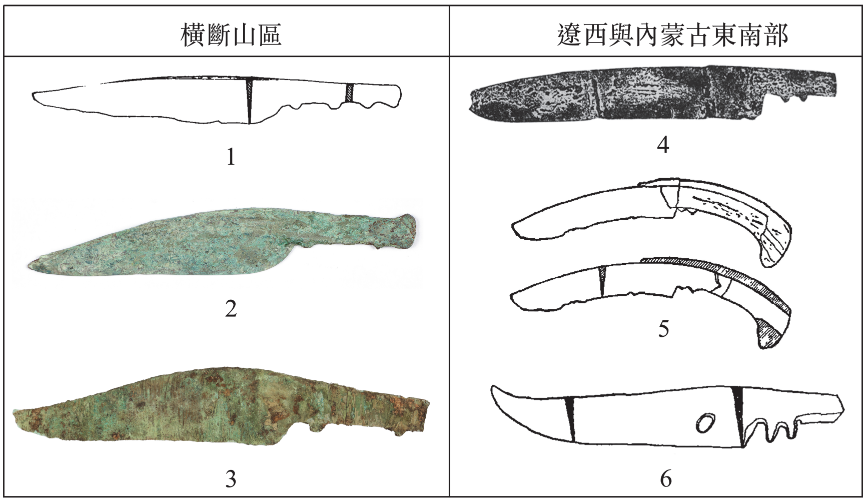

圖 4：橫斷山區齒柄舌銅刀與北方地區同類器比較

1. 四川四合 M6:22[85]；2-3. 四川老龍頭 M165:2、M632:9[86]；4. 內蒙古南山根 1958 年出土[87]；5. 遼寧鄭家窪子 M6512 出土[88]；6. 遼寧木頭溝 M1:4[89]

---

[83] 鄭紹宗，〈中國北方青銅短劍的分期及形制研究〉，頁 37-49；張家口市文物事業管理所、宣化縣文化館，〈河北宣化縣小白陽墓地發掘報告〉，《文物》1987 年 5 期：41-51；承德地區文物保護管理所、灤平縣文物保護管理所，〈河北省灤平縣梨樹溝門墓群清理發掘簡報〉，《文物春秋》1991 年 2 期：15-30；灤平縣博物館，〈河北省灤平縣梨樹溝門山戎墓地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1995 年 5 期：8-15。

[84]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甘肅工作隊，〈甘肅永靖蓮花台辛店文化遺址〉，《考古》1980 年 4 期：296-310。

[85] 涼山彝族地區考古隊，〈四川涼山喜德拉克公社大石墓〉，頁 100（圖 6）。

[86] 老龍頭 M165:2、M632:9 由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87] 李逸友，〈內蒙昭烏達盟出土的銅器調查〉，頁 277（圖 2）。

[88] 瀋陽故宮博物館、瀋陽市文物管理辦公室，〈瀋陽鄭家窪子的兩座青銅時代墓葬〉，頁 147（圖 7）。

[89] 靳楓毅，〈朝陽地區發現的劍柄端加重器及其相關遺物〉，頁 138（圖 5）。

雙圓餅首銅刀也集中分布於雅礱江下游地區，以鹽源盆地發現最多，[90] 西昌河西大石墓和會理也有零星發現，[91] 年代多約在公元前 6 至前 1 世紀。此類器物的首部為雙圓餅狀，雙圓餅緊密相連，或相分離但置於一長方形框內；雙柄，雙柄之間多有數處相連形成鏤空狀。刀首的雙圓餅常飾同心圓紋，少數素面；柄部常飾多道凸弦紋，少數飾連續粟點紋或繩索紋；近刀背處流行魚鰭紋（圖 5：1-4）。此類器物的器形和紋飾特徵可能融合了北方青銅文化的不同因素。

其中，橫斷山區雙圓餅首銅刀的刀首形態，可能受到了中國北方地區中、東部雙環首銅刀的影響，前者雙圓餅的配置方式與後者雙環的配置方式相同。鄂爾多斯高原採集的雙環首銅刀，[92] 其刀首的雙環或緊密相連，或置於一長方形框內（圖 5：7-8），兩種形態在橫斷山區均有發現。寧夏固原徵集的一件雙環首銅刀，雙環緊密相連，[93] 形態與鄂爾多斯 E・111 相似。冀北山地的北京軍都山玉皇廟、河北宣化小白陽、[94] 灤平苘子溝[95] 等墓地出土的雙環首銅刀，年代約在公元前 8 至前 4 世紀，其刀首的雙環緊密相連（圖 5：5），與河西大石墓出土雙圓餅首銅刀的首部形態相似。其中小白陽墓地出土銅刀似為實心的雙圓餅首（圖 5：6），暗示冀北山地的雙環首銅刀，可能融合了同時期該地區雙圓餅首銅劍的首部特徵而演化出雙圓餅首銅刀的新形態。除刀首形態外，橫斷山區雙圓餅首銅刀的一些紋飾也可在冀北山地找到相似者。鹽源 C:35 等雙圓餅首銅刀的柄部飾繩索紋，與玉皇廟 YYM19:3 雙環首銅刀的柄部紋飾相似，繩索紋在冀北山地出土約公元前 8 至前 5 世紀的銅劍的莖部更常見。[96] 鹽源 C:484 等雙圓餅首銅刀柄部常見的凸弦紋在冀北山地也較流行，常見於玉皇廟、葫蘆溝和西梁垙[97] 等墓地出土單環首銅刀的柄部。綜上，橫斷山區雙圓餅首銅刀的刀首形態和刀柄所飾繩索紋、凸弦紋，整體受到了冀北山地青銅器的影響。

---

[90] 除老龍頭墓地出土和鹽源採集的雙圓餅首銅刀外，還見於八家村墓地。參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鹽源縣八家村西漢墓葬發掘簡報〉，頁 4-12。

[91] 西昌地區博物館，〈西昌河西大石墓群〉，頁 91-96；唐翔，〈會理新近收藏的幾件青銅器〉，頁 16-18。

[92] 田廣金、郭素新主編，《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頁 20, 24。

[93] 現藏寧夏固原博物館（http://www.nxgybwg.com/e/action/ShowInfo.php?classid=18&id=132）。

[94] 張家口市文物事業管理所、宣化縣文化館，〈河北宣化縣小白陽墓地發掘報告〉，頁 41-51。

[95] 鄭紹宗，〈中國北方青銅短劍的分期及形制研究〉，頁 37-49。

[96] 鄭紹宗，〈中國北方青銅短劍的分期及形制研究〉，頁 37-49。

[97]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軍都山墓地——葫蘆溝與西梁垙》（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而橫斷山區雙圓餅首銅刀的雙柄、飾粟點紋和魚鰭紋等特徵，則與中國北方地區中部的甘寧地區密切相關。寧夏固原地區出土約公元前 7 至前 3 世紀的銅劍常為雙柄，其中彭陽莧麻村 XM:02 雙柄連接處呈鏤空狀，[98] 與橫斷山區雙圓餅首銅刀的柄部形態接近。日本收藏的多件中國北方系銅刀和銅劍也有鏤空狀雙柄（圖 5：10），但出土地點不明。[99] 鹽源 C:471 等雙圓餅首銅刀柄部所飾粟點紋在固原地區出土約公元前 6 至前 5 世紀的銅劍的柄部也較常見。[100] 鹽源 C:35、河西 M2:10 等雙圓餅首銅刀格部的山字形紋可能受到了固原地區山字格銅劍的影響。而橫斷山區雙圓餅首銅刀近刀背處流行的魚鰭紋，與甘肅靈台白草坡出土約公元前 11 至前 8 世紀的銅刀（M2:38）的紋飾相似，但有所簡化（圖 5：9）。[101]

銅刀是北方地區廣泛流行的一種切割工具，其中一些可能兼具砍殺或短兵功能。橫斷山區出土的多種類型的銅刀都受到了北方地區同類器的影響。其中齒柄舌銅刀的文化來源相對單一，其明確受到了中國北方地區東部的遼西和內蒙古東南部的齒柄舌銅刀的影響。而雙圓餅首銅刀的文化來源較為複雜，其吸收了中國北方地區中、東部多支青銅文化的不同因素，借鑒了這些青銅文化出土銅刀，以及銅劍的一些器形和紋飾特徵，並進行重組與融合，以冀北山地和寧夏固原地區青銅文化對其影響最顯著。

---

[98] 羅丰、韓孔樂，〈寧夏固原近年發現的北方系青銅器〉，《考古》1990 年 5 期：403-418；楊寧國、祁悅章，〈寧夏彭陽縣近年出土的北方系青銅器〉，頁 28-37。

[99] 東京國立博物館，《大草原の騎馬民族——中國北方の青銅器》（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1997），頁 18, 30-31, 61, 70。

[100] 羅丰、韓孔樂，〈寧夏固原近年發現的北方系青銅器〉，頁 403-418；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寧夏固原博物館，〈寧夏固原楊郎青銅文化墓地〉，《考古學報》1993 年 1 期：13-56；張偉寧，〈寧夏中衛出土的北方系青銅器〉，《考古與文物》2011 年 5 期：110。

[101] 甘肅省博物館文物隊，〈甘肅靈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學報》1977 年 2 期：99-1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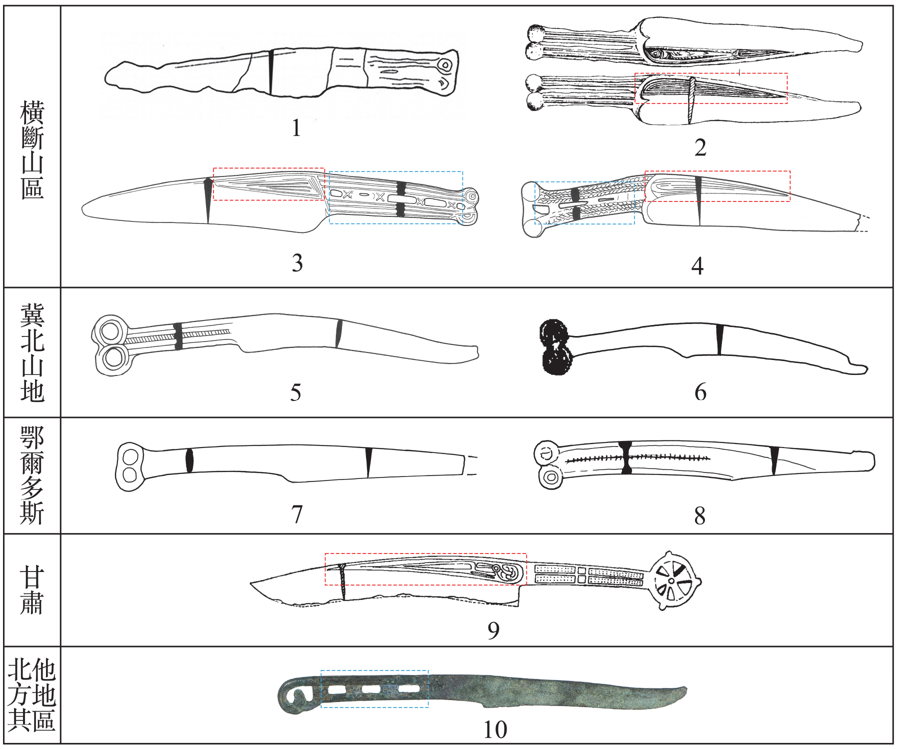

圖 5：橫斷山區雙圓餅首銅刀與北方地區同類器比較

1. 四川八家村 M14:4[102]；2. 四川河西 M2:10[103]；3-4. 四川鹽源 C:484、C:35[104]；5. 北京玉皇廟 YYM19:3[105]；6. 河北小白陽 M18:3[106]；7-8. 內蒙古鄂爾多斯 E・111[107]、E・185[108]；9. 甘肅白草坡 M2:38[109]；10.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110]

---

10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鹽源縣八家村西漢墓葬發掘簡報〉，頁 8（圖 9）。

103 西昌地區博物館，〈西昌河西大石墓群〉，頁 93（圖 4）。

104 鹽源 C:484、C:35 來自涼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老龍頭墓地與鹽源青銅器》，頁 106（圖 69）。

105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軍都山墓地——玉皇廟》，頁 1031（圖 624）。

106 張家口市文物事業管理所、宣化縣文化館，〈河北宣化縣小白陽墓地發掘報告〉，頁 46（圖 13）。

107 田廣金、郭素新，《鄂爾多斯式青銅器》，頁 20（圖 11）。

108 田廣金、郭素新，《鄂爾多斯式青銅器》，頁 24（圖 15）。

109 甘肅省博物館文物隊，〈甘肅靈台白草坡西周墓〉，頁 116（圖 15）。

110 東京國立博物館，《大草原の騎馬民族》，頁 70（圖 120）。

肆・鏡式承變：生活用具所見多元文化交融

橫斷山區出土青銅時代生活用具多為陶容器，另有少量銅容器和銅鏡等。銅容器的器類和數量較少，僅見於個別高等級墓葬中。它們大多是受其他地區青銅文化影響的產物，或為舶來品，其中川西北的茂縣牟托一號石棺墓出土銅罍與內蒙古東南部的寧城小黑石溝出土銅罍的形制接近，前者可能是從北方地區傳入的。[111] 銅鏡發現相對較多，一般認為其與歐亞草原的帶柄鏡有關。[112] 關於銅鏡的功能，有照容、裝飾、宗教用器、開放空間溝通的反射鏡等觀點。[113] 本文將結合新材料對此類器物再作討論。

銅鏡在橫斷山區發現於岷江上游至瀾滄江中游地區，以大渡河中游及其以南地區相對集中，除四川雅江本家地、[114] 爐霍呷拉宗 M2[115] 的銅鏡可早至約公元前 6 至前 4 世紀外，其餘多約在公元前 5 至前 2 世紀。其鏡身為圓板形，直徑多在 10 公分以下，鏡緣有柄或鈕，屬於帶柄鏡系統。以鏡緣有梯形或扇形扁銎的銎柄鏡發現最多，銎的末端多有對穿或圓環，用以鉚接其他材質的鏡柄或便於繫掛，鏡身與鏡柄結合處多有杏仁狀部位。銎柄鏡在中國北方和歐亞草原鮮少發現，其可能是在西方帶柄鏡影響下的本地創造。[116] 側鈕鏡、動物形柄鏡（即獸柄鏡）等其他類型的銅鏡相對較少，類似銅鏡在中國北方和歐亞草原較為流行，前者明顯受到後者影響。

---

111 田劍波、左志強、周志清，〈試論金沙遺址出土早期銅戈〉，《江漢考古》2018 年 4 期：67-74。

112 霍巍，〈西藏曲貢村石室墓出土的帶柄銅鏡及其相關問題初探〉，《考古》1994 年 7 期：650-661；霍巍，〈再論西藏帶柄銅鏡的有關問題〉，《考古》1997 年 11 期：61-69；呂紅亮，〈西藏帶柄銅鏡補論〉，《藏學學刊》第 5 輯（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9），頁 33-45；郭富，〈四川地區早期帶柄銅鏡的初步研究〉，《四川文物》2013 年 6 期：33-45。

113 郭富，〈四川地區早期帶柄銅鏡的初步研究〉，頁 33-45；黃銘崇，〈畜牧者與農耕者之間〉，頁 64；陳亞軍，〈河西走廊發現早期帶柄銅鏡研究〉，《敦煌學輯刊》2020 年 4 期：135-146。

114 甘孜考古隊，〈四川巴塘、雅江的石板墓〉，《考古》1981 年 3 期：213-218。

115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日本九州大學、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旅遊局、爐霍縣文化旅遊局，〈四川爐霍縣呷拉宗遺址發掘簡報〉，《四川文物》2012 年 3 期：15-28。

116 呂紅亮，〈西藏帶柄銅鏡補論〉，頁 33-45。

側鈕銅鏡，鏡緣一側有鈕，鈕上有一穿孔，通體素面。[117] 鈕有方形和環狀兩種形態，它們均能在中國北方和歐亞草原找到相似者。其中雲南祥雲紅土坡出土側鈕鏡（M14:131）有方形鈕，[118] 鈕上穿孔較小，可能用來與其他材質的鏡柄鉚接或便於懸掛（圖 6：1）。類似銅鏡在新疆至遼西均有發現，見於新疆天山地區（如察吾乎溝西、[119] 托背梁[120]）、河西走廊（如西崗、柴灣崗[121]）、甘肅東南部（如劉坪、[122] 馬家塬[123]）、寧夏南部（如于家莊[124]）、鄂爾多斯高原（如玉隆太[125]）、岱海地區（如忻州窯子、[126] 崞縣窯子[127]）、冀北山地（如隆化[128]）和遼西（如五道河子[129]）等地墓葬中（圖 6：2-8），年代集中在公元前 8 至前 3 世紀。此類銅鏡還發現於歐亞草原的哈薩克斯坦中部、天山七河、阿爾泰、外貝加爾等地區（圖 6：9-11），年代與中國北方的同類器接近。[130] 此外，鹽源老龍頭

[117] 張文立將此類銅鏡稱為「鈕柄鏡」。參見張文立，〈平山三汲出土銅鏡初識——兼論北方系鈕柄鏡〉，《邊疆考古研究》第 1 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頁 55-62。

[118] 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館，〈雲南祥雲紅土坡 14 號墓清理簡報〉，頁 4-14。

[119] 劉學堂，《絲路天山地區青銅器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17），頁 152, 154。

[120] 西北大學文化遺產保護與考古學研究中心等，〈2009 年新疆伊吾縣托背梁墓地發掘簡報〉，頁 24-36。

[121]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西崗柴灣崗：沙井文化墓葬發掘報告》（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1），頁 99-101, 168, 174。

[122]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水縣博物館，《清水劉坪》（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頁 206。

[123] 早期秦文化聯合考古隊、張家川回族自治縣博物館，〈張家川馬家塬戰國墓地 2007～2008 年發掘簡報〉，《文物》2009 年 10 期：25-51。

[124] 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寧夏彭堡于家莊墓地〉，《考古學報》1995 年 1 期：79-107。寧夏彭陽王大戶墓地出土銅器（M6:42）的形態與此型銅鏡相似，但較小，直徑 2.4 公分，是否為銅鏡待商榷，參見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彭陽縣文物管理所，《王大戶與九龍山——北方青銅文化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頁 201。

[125] 內蒙古博物館、內蒙古文物工作隊，〈內蒙古準格爾旗玉隆太的匈奴墓〉，《考古》1977 年 2 期：111-114。

[126]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內蒙古涼城縣忻州窯子墓地發掘簡報〉，《考古》2009 年 3 期：28-48。

[127]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涼城崞縣窯子墓地〉，《考古學報》1989 年 1 期：57-81。

[128] 鄭紹宗，〈略論中國北部長城地帶發現的動物紋青銅飾牌〉，《文物春秋》1991 年 4 期：1-32。

[129]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遼寧凌源縣五道河子戰國墓發掘簡報〉，《文物》1989 年 2 期：52-61。

[130] 楊建華等，《歐亞草原東部的金屬之路》，頁 297, 308, 342, 357, 417-418。

M333、M1100 出土側鈕鏡有環狀鈕，[131] 鈕上穿孔較大，可能用以懸掛，但它們的體量較小，不排除是飾件的可能（圖 7：1）。類似器物在雲南永勝堆子 M77、[132] 祥雲檢村 M1[133] 也有出土（圖 7：2-3）。此類銅鏡（飾）在中國北方地區中、西部和歐亞草原中部也有發現，見於新疆天山地區（如柴窩堡、[134] 三工河鄉、黑溝梁[135]）、河西走廊（如西崗[136]）、甘肅東南部（如馬家塬）以及蒙古西部的烏蘭固木、阿爾泰地區等地（圖7：4-7），[137] 年代大致與方形側鈕銅鏡相當。整體來看，中國北方和歐亞草原的側鈕鏡數量多、使用時間早、延續時間長，橫斷山區的側鈕鏡應受其影響。

---

[131] 根據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與周邊遺存的對比，推測 M333 和 M1100 的年代約在公元前 5 至前 2 世紀。但 M333 出土人骨的 C^{14} 測年為 2470±30 BP，樹輪校正年代為 766-422 BC（95.4%）。類似情況還見於老龍頭 M1080、M1148 等墓葬，它們的文化特徵與周邊地區目前認定為公元前 5 至前 2 世紀的遺存相近，但 C^{14} 測年要早至公元前 8 至前 5 世紀。造成這種矛盾的原因可能是目前對周邊遺存的年代認識普遍偏晚（多在公元前 5 世紀之後），並且一般認為它們較北方地區或中原地區的同類因素更晚。新的測年數據提醒我們應重新審視目前西南青銅文化的編年體系，現在一般認為年代在公元前 5 至前 2 世紀甚至更晚的一些遺存或文化特徵的出現時間可能要早到公元前 8 至前 5 世紀。未來需綜合文化特徵和測年數據對西南青銅文化的編年體系進行調整，這也將更新我們對西南地區與北方地區互動關係的認識，如帶柄銅鏡傳入西南地區的時間可能比目前認識為早。

[132] 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勝堆子遺址〉，雲南考古。

[133] 大理州文物管理所、祥雲縣文化館，〈雲南祥雲檢村石椁墓〉，頁 33-41。

[134] 劉學堂，《絲路天山地區青銅器研究》，頁 154。

[135] 劉學堂，《絲路天山地區青銅器研究》，頁 155。

[136]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西崗柴灣崗》，頁 99-101。

[137] 楊建華等，《歐亞草原東部的金屬之路》，頁 417-4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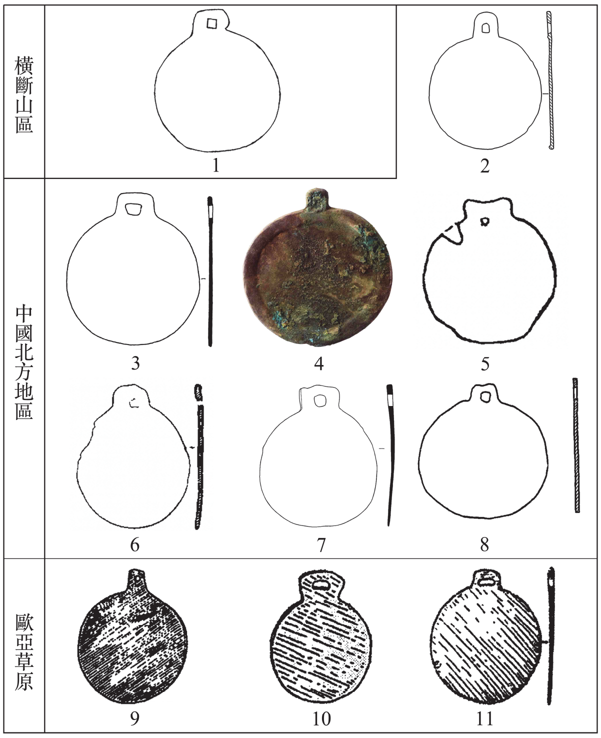

圖 6：橫斷山區方形側鈕銅鏡與北方地區同類器比較

1. 雲南紅土坡 M14:131[138]；2. 新疆托背梁 M15:1[139]；3. 甘肅柴灣崗 M75:5[140]；4. 甘肅馬家塬 M14:33[141]；5. 寧夏于家莊 M15:14[142]；6. 內蒙古玉隆太 2258[143]；7. 內蒙古忻州窯子 M23:2[144]；8. 河北隆化出土[145]；9. 哈薩克斯坦中部出土[146]；10. 天山七河地區出土[147]；11. 圖瓦出土[148]

---

138 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館，〈雲南祥雲紅土坡 14 號墓清理簡報〉，頁 5（圖 2）。

139 西北大學文化遺產保護與考古學研究中心等，〈2009 年新疆伊吾縣托背梁墓地發掘簡報〉，頁 32（圖 20）。

140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西崗柴灣崗》，頁 174（圖 66）。

141 早期秦文化聯合考古隊、張家川回族自治縣博物館，〈張家川馬家塬戰國墓地 2007～2008 年發掘簡報〉，頁 42（圖 44）。

142 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寧夏彭堡于家莊墓地〉，頁 92（圖 14）。

143 內蒙古博物館、內蒙古文物工作隊，〈內蒙古準格爾旗玉隆太的匈奴墓〉，頁 112（圖2）。

144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內蒙古涼城縣忻州窯子墓地發掘簡報〉，頁 40（圖 13）。

145 鄭紹宗，〈略論中國北部長城地帶發現的動物紋青銅飾牌〉，頁 4（圖 4）。

146 楊建華等，《歐亞草原東部的金屬之路》，頁 297（圖 5-1-21）。

147 楊建華等，《歐亞草原東部的金屬之路》，頁 308（圖 5-1-26）。

148 楊建華等，《歐亞草原東部的金屬之路》，頁 342（圖 5-1-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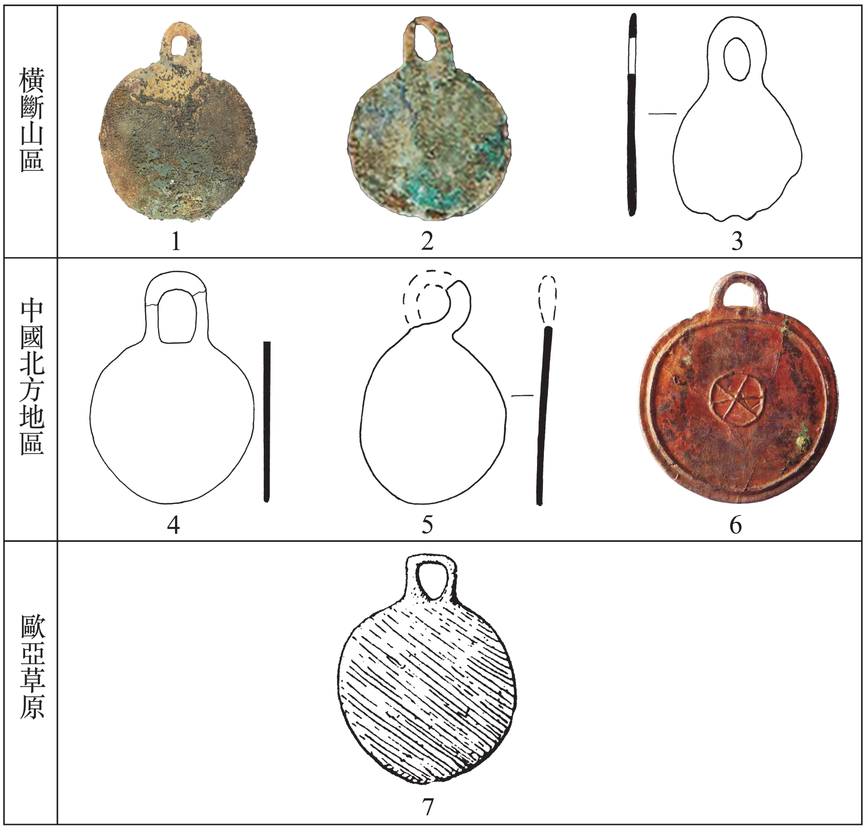

圖 7：橫斷山區環狀側鈕銅鏡（飾）與北方地區同類器比較

1. 四川老龍頭 M1100:32[149]；2. 雲南堆子 M77 出土[150]；3. 雲南檢村 M1 出土[151]；4. 新疆柴窩堡 M1a:1[152]；5. 甘肅西崗 M224:3[153]；6. 甘肅馬家塬 M15:9[154]；7. 阿爾泰地區出土[155]

149 老龍頭 M1100:32 由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150 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勝堆子遺址〉，雲南考古。

151 大理州文物管理所、祥雲縣文化館，〈雲南祥雲檢村石槨墓〉，頁 39（圖 25）。

152 劉學堂，《絲路天山地區青銅器研究》，頁 154（圖 56）。

153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西崗柴灣崗》，頁 101（圖 38）。

154 早期秦文化聯合考古隊、張家川回族自治縣博物館，〈張家川馬家塬戰國墓地 2007～2008 年發掘簡報〉，頁 45（圖 55）。

155 楊建華等，《歐亞草原東部的金屬之路》，頁 418（圖 5-3-10）。

獸柄銅鏡也是橫斷山區與中國北方和歐亞草原的共同器類。橫斷山區僅四川蘆山官田壩、[156] 鹽源老龍頭 M1080、雲南昌寧墳嶺崗 M21 和 M23[157] 等墓葬出土少量獸柄銅鏡（圖 8：1-3, 5-6）。此類銅鏡在新疆天山地區（如葉什克列克墓地和哈密伊吾縣[158]）、寧夏南部（如于家莊）、鄂爾多斯高原（如呼魯斯太[159]）、陝北和晉北[160] 等中國北方中、西部地區有發現（圖 8：7-9），年代約在公元前 6 至前 1 世紀。類似銅鏡在歐亞草原中部的哈薩克斯坦中部、天山七河、阿爾泰、米努辛斯克盆地、圖瓦和偏東的蒙古、外貝加爾等地也有發現（圖 8：10-13），[161] 年代與中國北方的同類器大致相當。[162] 儘管動物類型有差異，這些銅鏡的風格特徵是一致的。其中四川蘆山官田壩 II 式銅鏡與哈薩克斯坦卡拉姆隆遺址出土銅鏡上的立獸都為羊的形象（圖 8：1, 10）。[163] 雲南昌寧墳嶺崗出土銅鏡柄部的動物為相向而立的兩頭野豬或大象，與陝北、晉北採集銅鏡上對獸的風格相似，雲南楚雄萬家壩出土鏤空銅牌飾的鈕部也為對獸（圖 8：4）。[164] 四川鹽源老龍頭 M1080 與外貝加爾出土銅鏡上均為簡化的立獸（圖 8：2, 11）。[165] 四川蘆山官田壩 I 式銅鏡與內蒙古新州博物館藏銅鏡（Z00835）具有一定相似性，[166] 鏡背與鏡柄銜接處飾幾何紋，其內都填以圓圈紋和點紋；鏡柄均不作幾何形，而作花瓣形或動物形，末端有穿孔（圖 8：5, 9）。此外，四川寶興漢塔山 M24 出土鋬柄鏡融合了獸柄鏡的特點，鋬的末端為一鏤空的虎（圖 8：6）。[167] 綜上，橫斷山區獸柄銅鏡的整體風格特徵與歐亞草原和中國北方地區中、西部的獸柄銅鏡接近，一些具體的動物形象也相似，前者受到後者影響。

---

156 郭鳳武，〈蘆山思延鄉戰國墓清理報告〉，頁 76-79。

157 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雲南昌寧墳嶺崗青銅時代墓地〉，頁 4-20, 70。

158 劉學堂，《絲路天山地區青銅器研究》，頁 155。

159 塔拉、梁京明，〈呼魯斯太匈奴墓〉，《文物》1980 年 7 期：11-12。

160 鄭紹宗，〈略論中國北部長城地帶發現的動物紋青銅飾牌〉，頁 1-32。

161 楊建華等，《歐亞草原東部的金屬之路》，頁 297, 308, 329, 342, 417-418。

162 動物紋裝飾是中國北方和歐亞草原的文化傳統，其早在公元前兩千紀已經形成，並且在兩地間存在交流。參見邵會秋，〈中國北方、新疆和歐亞草原文化的交往——以動物紋裝飾為視角〉，《西域研究》2018 年 2 期：43-56。

163 楊建華等，《歐亞草原東部的金屬之路》，頁 297。

164 雲南省文物工作隊，〈楚雄萬家壩古墓群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83 年 3 期：347-382。

165 楊建華等，《歐亞草原東部的金屬之路》，頁 357。

166 楊妹，〈新州博物館收藏的夏家店上層文化青銅器、石範及相關問題的分析〉，《赤峰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 年 5 期：8-13。

167 四川省文管會等，〈四川寶興漢塔山戰國土坑積石墓發掘報告〉，頁 337-3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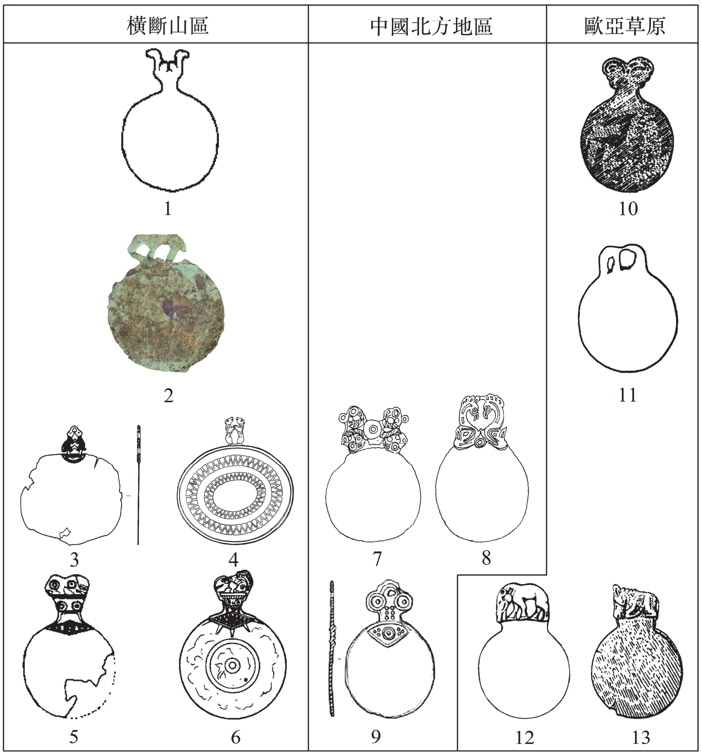

圖 8：橫斷山區獸柄銅鏡（飾）與北方地區同類器比較

1. 四川官田壩出土（II 式）[168]；2. 四川老龍頭 M1080:7[169]；3. 雲南墳嶺崗 M21:3[170]；4. 雲南萬家壩 M63:3[171]；5. 四川官田壩出土（I 式）；6. 四川漢塔山 M24:3[172]；7-8. 舊綏遠出土[173]；9. 新州博物館藏[174]；10. 哈薩克斯坦卡拉姆隆出土[175]；11. 外貝加爾出土；12. 蒙古出土；13. 圖瓦出土[176]

---

168 官田壩I式和II式獸柄銅鏡來自郭鳳武，〈蘆山思延鄉戰國墓清理報告〉，頁 77（圖 3）。
169 老龍頭 M1080:7 由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170 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雲南昌寧墳嶺崗青銅時代墓地〉，頁 14（圖 25）。
171 雲南省文物工作隊，〈楚雄萬家壩古墓群發掘報告〉，頁 370（圖 32）。
172 四川省文管會等，〈四川寶興漢塔山戰國土坑積石墓發掘報告〉，頁 355（圖 19）。
173 舊綏遠出土獸柄銅鏡來自鄭紹宗，〈略論中國北部長城地帶發現的動物紋青銅飾牌〉，頁 14（圖 56、57）。
174 楊妹，〈新州博物館收藏的夏家店上層文化青銅器、石範及相關問題的分析〉，頁 9（圖 2）。
175 楊建華等，《歐亞草原東部的金屬之路》，頁 297（圖 5-1-21）。
176 外貝加爾、蒙古和圖瓦出土獸柄銅鏡來自楊建華等，《歐亞草原東部的金屬之路》，頁 418（圖 5-3-10）。

帶柄鏡是古代西方流行的銅鏡系統，鏡緣有柄，區別於古代東亞地區常見的圓板具鈕鏡。帶柄銅鏡在公元前三千紀已在中亞、西亞等地出現，至早期鐵器時代更為流行。[177] 帶柄銅鏡在中國北方地區和橫斷山區流行於公元前 8 至前 2 世紀，其是西方帶柄鏡系統向東傳播的產物，與歐亞草原中部地區聯繫密切。不同類型的帶柄銅鏡可能有不同的傳播路徑。其中，方形側鈕鏡可能從歐亞草原中部經新疆天山地區、河西走廊至寧夏南部、甘肅東南部地區，然後一支向東傳播至鄂爾多斯高原、岱海地區直至遼西地區，另一支向南沿青藏高原東麓傳播至川西南山地和滇西北高原等地。環狀側鈕鏡的傳播路線與方形側鈕鏡大致相同，但基本上只見於南向支線上，未影響到寧夏南部以東地區。從西藏發現的帶柄鏡實物和圖像來看，不排除側鈕鏡從中亞經新疆至西藏高原再東傳至橫斷山區的可能。[178] 獸柄鏡可能主要從歐亞草原中部經新疆天山地區、河西走廊自西向東傳播，而外貝加爾地區的發現，暗示可能存在自蒙古高原南下至中國北方長城地帶的路線，兩條路線在甘肅東南部匯合後繼續向南進入橫斷山區。

伍・馬俗傳新：馬具與葬馬習俗所見多元文化交融

隨葬馬具和埋葬馬骨的習俗是橫斷山區青銅文化的特徵之一，也是北方畜牧文化的重要標誌，反映出兩地喪葬習俗的共性特徵。馬具和葬馬遺存在橫斷山區僅見於少數墓葬中，但在北方地區卻十分流行，前者應受到後者的影響。

馬具在橫斷山區集中發現於雅礱江流域，四川爐霍瓦爾壁、[179] 鹽源老龍頭、八家村、[180] 九龍小偏橋[181] 等墓地有出土，金沙江中游的四川會理郭家堡和雲南祥雲紅土坡也有零星發現，年代多約在公元前 5 至前 1 世紀。這些馬具大多為銅質，器類包括馬銜、馬鑣、節約、泡飾等。銅馬銜大多為兩節直杆式，其中

[177] 霍巍，〈西藏曲貢村石室墓出土的帶柄銅鏡及其相關問題初探〉，頁 650-661；霍巍，〈再論西藏帶柄銅鏡的有關問題〉，頁 61-69。

[178] 霍巍，〈再論西藏帶柄銅鏡的有關問題〉，頁 61-69；霍巍，〈論西藏帶柄銅鏡的東、西兩系〉，《考古與文物》2024 年 4 期：63-71。

[179]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爐霍縣文物管理所，〈四川爐霍縣斯木鄉瓦爾壁 M1 發掘簡報〉，頁 10-13。

[18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鹽源縣八家村西漢墓葬發掘簡報〉，頁 4-12。

[18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九龍縣文化旅遊局，〈九龍縣烏拉溪鄉石棺葬墓調查清理簡報〉，頁 25-30。

瓦爾壁 M1、八家村 M19 等墓葬出土銅馬銜的內、外環均為圓形，內環明顯小於外環，此類器物在公元前 6 至前 5 世紀以後的中國北方地區十分流行（圖 9：1, 5）。[182] 馬鑣有角形骨鑣、弓形銅鑣等。其中老龍頭 M163 和 M1148 出土銅鑣為弓形，鑣身有雙孔。M163 的鑣頭作鳥首形（圖 9：3），M1148 的鑣頭和鑣尾均作鳥首形（圖 9：2），它們的鳥喙均朝向弓背一側。獸首弓形鑣約在公元前 8 至前 6 世紀出現於冀北山地，在公元前 6 至前 4 世紀見於冀北山地和晉陝高原，獸首的吻部一般也朝向弓背（圖 9：6-7）。[183] 老龍頭 M163 和 M1148 出土馬鑣可能受到冀北山地獸首弓形鑣的影響，但其鑣頭和鑣尾的鳥首具有本地特色，類似形態的鳥首還見於老龍頭 M1688 出土銅工形器等器物上。節約的類型多樣，其中老龍頭 M458 出土銅節約的形態與鄂爾多斯採集的輪狀銅節約相似（圖 9：4, 8）。[184] 綜上，橫斷山區出土的兩節直杆式銅馬銜、鳥首弓形銅鑣、輪狀銅節約等馬具受到中國北方地區尤其是中部的鄂爾多斯高原、晉陝高原和東部的冀北山地的同類器的影響，器形大多較北方地區的同類器有所變異。

[182] 邵會秋，〈先秦時期北方地區金屬馬銜研究〉，《邊疆考古研究》第 3 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頁 96-114。

[183] 邵會秋、石婧靜，〈中國北方地區先秦時期馬鑣研究（一）〉，《草原文物》2018 年 2 期：35-53。

[184] 田廣金、郭素新，《鄂爾多斯式青銅器》，頁 1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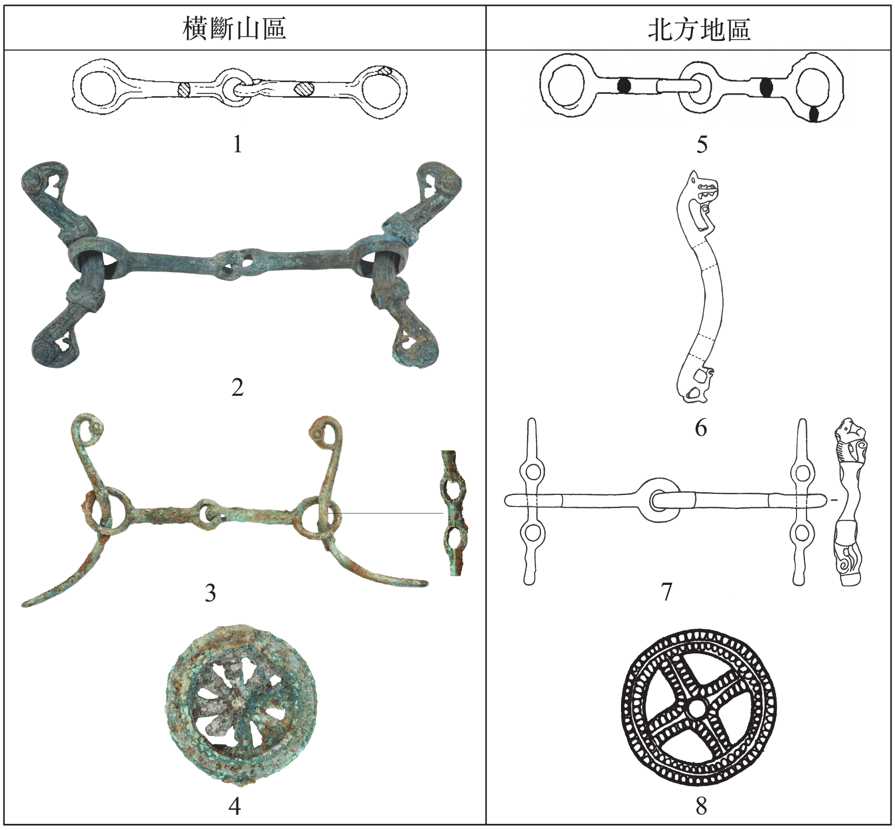

圖 9：橫斷山區銅馬具與北方地區同類器比較

1. 四川瓦爾壁 M1:2[185]；2-4. 四川老龍頭 M1148:11、M163:12、M458:13[186]；5. 河北北辛堡 M1:68[187]；6-7. 北京玉皇廟 YYM156:15-3[188]、YYM18:25-1[189]；8. 內蒙古鄂爾多斯 E・1659[190]

---

185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爐霍縣文物管理所，〈四川爐霍縣斯木鄉瓦爾壁 M1 發掘簡報〉，頁 12（圖 4）。

186 老龍頭出土馬銜、馬鑣和節約由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187 河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隊，〈河北懷來北辛堡戰國墓〉，《考古》1966年5期：237（圖8）。

188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軍都山墓地——玉皇廟》，頁 1143（圖 677）。

189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軍都山墓地——玉皇廟》，頁 1139（圖 674）。

190 田廣金、郭素新，《鄂爾多斯式青銅器》，頁 155（圖 110）。

埋葬馬骨的墓葬在橫斷山區均分布於雅礱江流域，除四川爐霍瓦爾壁、新龍谷日、[191] 甘孜吉里龍[192] 等墓地有零星發現外，其餘集中於老龍頭墓地，年代多在公元前 5 至前 2 世紀，一般為大中型墓葬。各墓出土馬骨遺存中，整具馬骨較少，多為頭骨和肢骨。葬馬和頭蹄葬是先秦時期中國北方和歐亞草原普遍流行的習俗，在與橫斷山區聯繫密切的河西走廊、甘寧地區、內蒙古中南部和冀北山地等地有廣泛分布，頭蹄葬的動物種屬常見馬、牛、羊，葬馬的墓葬等級相對較高。[193] 歐亞草原中部的圖瓦地區和阿爾泰地區的大型墓葬也葬馬（圖 10）。[194] 橫斷山區的葬馬和頭蹄葬習俗應受到北方地區的影響，兩地對馬在喪葬活動中的價值認同有一定相似性。

圖 10：阿爾然二號塚殉馬坑[195]

橫斷山區墓葬中馬骨的埋葬位置多樣，大多置於墓室內但具體位置無一定規律，如置於人骨上方填土中、置於二層台上、置於人骨頭端或腳端等，個別置於墓道內或單獨的馬坑中。這些葬馬位置可在北方地區找到相似者，它們可能受到了北方地區同類葬俗的影響。

---

[191] 格勒，〈新龍谷日的石棺葬及其族屬問題〉，頁 11-15。

[192]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館，〈四川甘孜縣吉里龍古墓葬〉，頁 28-36。

[193] 包曙光，〈中國北方地區夏至戰國時期的殉牲研究〉（長春：吉林大學文學院博士論文，2014）；劉羽陽、王輝，〈先秦時期西北遊牧地區動物埋葬習俗——從埋葬頭蹄的現象談起〉，《考古與文物》2017 年 1 期：62-69；盧月珊，〈中國北方地區先秦時期葬馬遺存研究〉（長春：吉林大學考古學院碩士論文，2022）。

[194] 楊建華等，《歐亞草原東部的金屬之路》，頁 223-226, 348-350。

[195] 楊建華等，《歐亞草原東部的金屬之路》，圖版 6。

瓦爾壁 M1 為豎穴墓道洞室墓，墓道東壁（長邊）下部向外挖掘墓室，墓室長邊平行於墓道長邊，墓道東壁寬於墓室，墓室底部低於墓道底部，墓道底部埋有馬的頭骨和肢骨，馬吻部的朝向與墓主頭向一致，馬骨附近出土馬銜、馬鑣、鈴等馬具。豎穴墓道洞室墓在河西走廊的沙井文化墓葬（如蛤蟆墩、[196] 西崗、柴灣崗）、寧夏南部的楊郎文化墓葬（如馬莊、[197] 于家莊、張街村、[198] 王大戶[199]）、內蒙古中南部公元前 8 至前 3 世紀的墓葬（如小雙古城[200]）中十分流行，且都有在墓道內埋葬牛、羊、馬的頭蹄的習俗，動物的吻部一般與墓主頭向相同。其中沙井文化墓葬在墓道長邊下部挖掘墓室，墓室長邊與墓道長邊平行，洞室較淺，墓室底部低於墓道底部，這些特徵與瓦爾壁 M1 相近。河西走廊、寧夏南部和內蒙古中南部的豎穴墓道洞室墓與新疆伊犁河流域的洞室墓屬於同一系統，後者源自中亞地區並可追溯至裏海和黑海北部的洞室墓文化。[201] 綜上，瓦爾壁 M1 的墓葬形制和葬馬習俗可能受到中國北方地區中、西部文化的影響。

吉里龍 M3 為長方形石棺墓，墓主為成年男性，墓主頭端上方鋪黃土，其上放置馬頭，墓主腳端的石蓋板上也鋪黃土，其上疊放狗和馬的肢骨。墓室內人骨上方葬馬的習俗在公元前 6 至前 3 世紀寧夏南部和內蒙古中南部的墓葬中有發現，如寧夏呂坪村、[202] 張街村，內蒙古桃紅巴拉 M1 和 M2、[203] 呼魯斯太 M2、[204] 忻州窯子 M28、[205] 崞縣窯子 M5、[206] 毛慶溝 M31 和 M45[207] 等，常見馬、羊、牛等動物的頭骨層層疊置，單獨葬馬者只佔有殉葬動物墓葬的少數，墓主性別和年齡明確者基本都為成年男性。類似現象還見於約公元前 8 至前 4 世紀冀北山地的

---

196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三角城與蛤蟆墩沙井文化遺存〉，《考古學報》1990 年 2 期：205-237。

197 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寧夏固原博物館，〈寧夏固原楊郎青銅文化墓地〉，頁 13-56。

198 楊寧國、祁悅章，〈寧夏彭陽縣近年出土的北方系青銅器〉，頁 28-37。

199 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彭陽縣文物管理所，《王大戶與九龍山》，頁 19-224。

200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內蒙古涼城縣小雙古城墓地發掘簡報〉，《考古》2009 年 3 期：15-27。

201 韓建業，〈中國先秦洞室墓譜系初探〉，《中國歷史文物》2007 年 4 期：16-25。

202 固原博物館，〈寧夏固原呂坪村發現一座東周墓〉，《考古》1992 年 5 期：469-470。

203 田廣金，〈桃紅巴拉的匈奴墓〉，《考古學報》1976 年 1 期：131-144。

204 塔拉、梁京明，〈呼魯斯太匈奴墓〉，頁 11-12。

205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內蒙古涼城縣忻州窯子墓地發掘簡報〉，頁 28-48。

206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涼城崞縣窯子墓地〉，頁 57-81。

207 內蒙古文物工作隊，〈毛慶溝墓地〉，田廣金、郭素新主編，《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頁 227-315。

墓葬中。葬馬墓葬佔玉皇廟墓地有殉牲墓葬的 6.7%，其中將馬置於墓主頭端上方填土中的墓葬佔 53%，這些墓葬中馬與牛、羊、狗組合，墓主基本為成年男性。河北灤平梨樹溝門、[208] 懷來北辛堡[209] 等墓地的馬骨放置於木棺或木槨蓋板頭端上部的填土中。綜上，吉里龍 M3 葬馬的位置及墓主身分與中國北方地區中、東部較接近。

老龍頭 M4、M76、M1100 等少數大中型墓葬在長方形墓室內的二層台上葬馬的頭骨、牙齒、肢骨等。此葬俗見於冀北山地玉皇廟墓地的大中型墓葬中，佔該墓地葬馬墓葬的 41.2%，西梁垙墓地的大型墓葬 M25 也有此類葬俗。此外，老龍頭 M333 南側附有一長方形葬馬坑（K12），坑內發現多具馬骨，至少包括 1 具完整馬骨、2 個馬頭骨和若干肢骨，在一馬頭骨口部出土銅馬銜，未發現車器（圖 11），有別於中原地區的車馬坑。[210] 甘肅東部的寧縣袁家村、正寧縣後莊村、鎮原縣紅岩村等墓葬（年代約在公元前 5 至前 3 世紀）也附帶葬馬坑。[211]

圖 11：四川老龍頭墓地葬馬坑 K12[212]

208 承德地區文物保護管理所、灤平縣文物保護管理所，〈河北省灤平縣梨樹溝門墓群清理發掘簡報〉，頁 15-30；灤平縣博物館，〈河北省灤平縣梨樹溝門山戎墓地清理簡報〉，頁 8-15。

209 河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隊，〈河北懷來北辛堡戰國墓〉，頁 231-242。

210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鹽源縣老龍頭墓地 2020～2024 年的發掘〉，頁 58-77。

211 劉得禎、許俊臣，〈甘肅慶陽春秋戰國墓葬的清理〉，《考古》1988 年 5 期：413-424。

212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馬是中國北方和歐亞草原遊牧人群生產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機動性強，既提高了放牧的效率和防衛作戰的能力，又加速了文化的傳播。橫斷山區擁有與北方地區相似的高山草場資源，為畜牧業的發展提供了天然條件，當地深受北方地區遊牧技術與觀念的影響。橫斷山區一些馬具的器形、在長方形墓室內葬馬或附帶單獨葬馬坑的習俗，明顯受到中國北方地區中、東部的影響，而豎穴墓道洞室墓的墓葬形制及在墓道內葬馬的習俗，與中國北方地區中、西部關係密切，甚至可追溯至歐亞草原中部地區。除馬具和葬馬習俗外，橫斷山區還出土銅馬模型和馬形飾件，鹽源盆地流行的銅枝形器上也常見馬和人騎馬的形象，它們都反映出橫斷山區與北方遊牧人群的密切聯繫。

陸・兼融與創新：跨區域文化互動的機制與歷史背景

橫斷山區青銅文化受到了北方青銅文化的強烈影響，它們之間的文化聯繫多樣，交流機制複雜。橫斷山區與北方地區的早期文化交流不是空泛的，而是由多條有明確時間和空間指向性的具體聯繫構成的互動網絡。整體來看，兩地早期的文化交流主要沿中國北方地區東、中部和中國北方地區西、中部兩條路線進行，東、西兩線在寧夏南部、甘肅東部交匯後沿青藏高原東麓南下進入西南山地（圖12）。其中橫斷山區發現的雙圓餅首銅短劍、齒柄舌銅刀、雙圓餅首銅刀、鳥首弓形銅馬鑣、輪狀銅節約等器物，在人骨上方或二層台上葬馬頭蹄的習俗，以及將葬馬作為身分象徵的價值認同等文化特徵，與沿東線進行的文化交流相關。而橫斷山區發現的直柄馬鞍形首銅短劍、側鈕銅鏡、獸柄銅鏡等器物，和豎穴墓道洞室墓的墓葬形制及在其墓道內葬馬頭蹄的習俗等文化特徵，與沿西線進行的文化交流相關。東、西兩線的文化交流並不是完全獨立的，一些文化特徵的形成（如曲柄馬鞍形首銅短劍）是東、西兩線文化交融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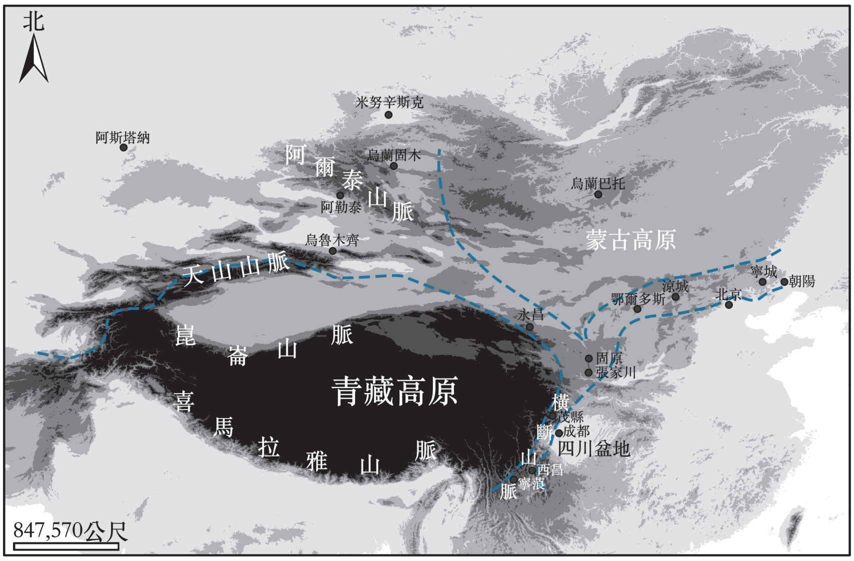

圖 12：橫斷山區與北方地區早期文化交流主要路線示意圖[213]

在沿東線進行的文化交流中，處於東端的冀北山地、遼西地區和內蒙古東南部，處於中部的內蒙古中南部、晉陝高原和寧夏南部，是文化傳播的重要節點。冀北、遼西與內蒙古東南部的交界地帶對橫斷山區青銅文化的形成有重要意義。橫斷山區出土扁長方形莖的雙圓餅首銅短劍、鳥首弓形銅鏃等器物，以及在長方形墓室內葬馬的習俗，均受到冀北山地玉皇廟文化的影響。扭辮狀莖的雙圓餅首銅短劍則在冀北山地雙圓餅首銅短劍的基礎上，吸收了內蒙古東南部青銅器扭辮狀莖的特徵。牟托一號石棺墓出土銅罍與內蒙古東南部的同類器相似。齒柄舌銅刀明顯受到遼西和內蒙古東南部同類器的影響。雙圓餅首銅短劍、扭辮狀莖、齒柄舌銅刀和銅罍的空間分布，在內蒙古東南部的寧城發生重疊，暗示寧城地區與橫斷山區早期文化和人群的密切聯繫。此外，北方地區東部青銅文化向橫斷山區傳播過程中，吸收了寧夏南部青銅文化的一些特徵，反映出文化傳播過程中多元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這在橫斷山區出土雙柄的雙圓餅首銅短劍和雙圓餅首銅刀上，有較好體現，兩者分別在冀北山地的雙圓餅首銅短劍和雙環首銅刀的基礎上，融合了寧夏固原地區銅短劍雙柄式莖和山字形格的特徵。

---

213 圖中城市位置從 Google 地圖獲取。本圖中藍色虛線範圍僅指示兩地交流主要路線的大致方向。兩地交流可能還存在沿青藏高原南緣或蒙古高原至北方長城地帶再南下的路線，由於缺少中間地帶的考古發現，無法明確具體走向。

西線的文化交流主要表現在歐亞草原中部青銅時代至早期鐵器時代文化的東向傳播，它們通過新疆天山地區，經河西走廊至寧夏南部和甘肅東部，然後沿青藏高原東麓南下進入橫斷山區。橫斷山區的豎穴墓道洞室墓，及在豎穴墓道內葬馬的習俗、直柄馬鞍形首銅短劍、方形或環狀側鈕銅鏡、獸柄銅鏡等文化因素，在新疆天山地區至寧夏南部有廣泛分布，與蘇貝希文化、沙井文化、楊郎文化等青銅文化聯繫密切，並可追溯至歐亞草原中部地區。

橫斷山區地處歐亞大陸東部東、西兩條文化傳播帶的交匯地帶，當地青銅文化是東西文化交融的產物。其中曲柄馬鞍形首銅短劍融合了中亞地區羊角形首短劍的劍首、中國北方地區曲柄短劍的曲柄和東北亞地區觸角式短劍劍柄分節的特徵改造而成。此外，東西方文化因素還共存於同一墓地，為同一人群所接受，這在鹽源老龍頭墓地表現得尤為突出。該墓地青銅文化具有鮮明的兼容並蓄、多元融合的特點，既發現與中國北方地區中、東部密切相關的雙圓餅首銅短劍、雙圓餅首銅刀、齒柄舌銅刀等器物和葬馬習俗，也發現與中國北方地區中、西部和歐亞草原中部密切相關的帶柄銅鏡、雙馬神信仰等因素。[214]

北方青銅文化向橫斷山區的傳播，是自新石器時代晚期以來，北方文化和人群南下浪潮的繼續。新石器時代晚期，甘青地區文化和農業人群的南下，推動了橫斷山區的新石器化和農業化進程，也是該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變遷的最大外在動力。起源於黃土高原的粟黍隨甘青地區人群的南下傳入橫斷山區，成為橫斷山區新石器時代的主要糧食作物，並在當地形成長達幾千年的種植傳統，它們還經橫斷山區傳播至成都平原和大陸東南亞地區。此時橫斷山區可能也與新疆地區建立了文化聯繫，兩地的文化交流應是通過甘青地區間接實現的，河西走廊和青藏高原東麓的文化通道發揮了重要作用。青銅時代早期，橫斷山區繼續保持了與甘青地區的密切聯繫，集中體現在陶器方面。同時，歐亞草原青銅技術傳統也經西北地區傳入橫斷山區，其以裝飾品、工具和兵器為組合並廣泛使用石範技術，有別於中原地區的商周青銅文化以使用青銅容器和塊範法為特徵的文化傳統，奠定了橫斷山區整個青銅時代的技術傳統和器用傳統，非容器的器物組合、石範技術及鑄匠墓、使用錫青銅和紅銅等文化特徵，一直延續至青銅時代晚期。橫斷山區

214 老龍頭墓地出土和鹽源採集的銅枝形器，其上常見對稱的雙馬形象，與中亞地區的雙馬神相似。雙馬神是古代印歐人的神祇之一，最早見於公元前 3200 年至前 2200 年的裏海—黑海北岸地區。雙馬神信仰後被歐亞草原遊牧人群所傳承，約在公元前 15 至前 12 世紀傳入中國北方地區。橫斷山區的雙馬形象是該信仰經中國西北地區南傳的反映。參見涼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老龍頭墓地與鹽源青銅器》，頁 195。

還處於歐亞草原技術傳統向大陸東南亞傳播的節點上。起源於西方的麥類作物在這一時期也經新疆、河西走廊、甘青地區傳入橫斷山區，改變了當地的作物結構，至青銅時代晚期當地開始普遍種植並延續至今。青銅時代晚期，橫斷山區與北方地區的文化聯繫加強，來自東、西不同方向的多種文化進入橫斷山區，多元文化的融合頻繁。橫斷山區對北方青銅文化中以短劍和刀為代表的實用性器物的接受程度較高，它們不僅分布廣泛、類型多樣，而且為石棺墓、大石墓、土坑墓等不同文化傳統的人群所接受，不同社會階層對此類器物的使用區分也不明顯。葬馬、豎穴墓道洞室墓等喪葬習俗的分布範圍和使用人群則較局限，其中葬馬習俗一般見於等級較高的大中型墓葬中，可能是身分地位和財富的象徵，其使用情境和象徵意義與北方地區的葬馬遺存具有相似性，反映出兩地在身分認同上的共性特徵。這一時期沿西線的文化流動，是前一階段歐亞草原技術傳統和遊牧人群東進和南下浪潮的繼續；而沿東線的文化流動的繁榮，也孕育於更早時期，如半月形穿孔石刀、商式銅戈等器物，在從中國東北至西南的半月形地帶的廣泛發現，[215] 公元前 8 世紀以後，北方長城地帶與歐亞草原中部東西向文化互動的頻繁，也起到了加速作用。[216] 縱觀橫斷山區與北方地區的早期文化交流，東、西兩條文化交流路線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已經孕育，青銅時代早期初步發展，以西線更顯著，至青銅時代晚期走向繁榮。這兩條路線是先秦時期溝通東西方文明的早期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不僅溝通橫斷山區與北方地區，還繼續向南延伸至東南亞、南亞等地，為秦漢以後真正意義上的絲綢之路的開通奠定了基礎。

在空間分布上，橫斷山區南部的金沙江中游地區發現的北方青銅文化因素，較北部的岷江上游至大渡河中游地區更濃厚，相關因素數量較多且複雜多樣，在雅礱江下游地區表現得尤為突出，這可能與周鄰文化的強弱態勢有關。在青銅時代早期，成都平原的十二橋文化向岷江上游和大渡河中游地區強勢擴張，其影響範圍止於大渡河中游的漢源至石棉一線。[217] 至青銅時代晚期，岷江上游地區受到蜀文化、楚文化等東部青銅文化的顯著影響，大渡河中游地區的蜀文化因素則十分濃厚，大渡河中游以南地區僅發現少量蜀式銅器。縱觀整個青銅時代，東部青銅文化向橫斷山區的強勢擴張，主要面向大渡河中游及其以北地區，而未繼續大規模向南、向西深入；相反，北方青銅文化自北向南影響了橫斷山區全域，以

---

215 田劍波等，〈試論金沙遺址出土早期銅戈〉，頁 67-74。

216 楊建華等，《歐亞草原東部的金屬之路》，頁 405-444。

217 周志清，〈橫斷山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的互動〉，頁 15-25。

大渡河中游以南地區更強烈。從更大的視角看，北方青銅文化與蜀文化等東部青銅文化在橫斷山區的強弱態勢，是以北方青銅文化為代表的畜牧文化與以商周青銅文化為代表的農耕文化的拉鋸。北方畜牧文化對橫斷山區是從技術傳統、器用傳統到喪葬觀念和信仰體系等方面的全方位影響。而商周農耕文化對橫斷山區的影響則表現在兵器等少數器物上，其以成套銅容器為核心的禮制傳統未見於橫斷山區。其中蜀文化因與橫斷山區鄰近的地緣關係而對後者影響較明顯；楚文化等南方青銅文化可能通過蜀文化與岷江上游地區間接聯繫，相關器物僅見於個別高等級墓葬中且其中一些為舶來品。[218] 中原文化對橫斷山區的影響甚微，僅零星發現有商式戈和商式鉞，類似器物在中國北方也有發現，它們可能也是隨北方文化的南下傳入的。

橫斷山區青銅文化與北方青銅文化、商周青銅文化的親疏關係和交流機制的差異，植根於畜牧區與農耕區自然環境的差異，以及由此形成的兩種不同的生產生活方式和觀念體系。橫斷山區與北方地區自然環境接近，並都處在歷史上的農牧交錯地帶，畜牧或半農半牧是兩地主要的生業方式，與之相適應的是使用輕便易攜的非容器的器用傳統和隨葬馬等動物的喪葬傳統，這是北方青銅文化在橫斷山區接受度較高的重要原因。據《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橫斷山區青銅時代晚期的族群眾多，其中邛都「耕田，有邑聚」，為定居的農業人群；徙、筰都和冉駹「或土著，或移徙」，為半農半牧的人群；嶲、昆明「隨畜遷徙，毋常處」，為遊牧人群。[219] 一般認為，冉駹主要分布在岷江上游和大渡河上游地區，與當地的石棺葬文化密切相關；邛都主要生活在安寧河流域，與當地的大石墓文化聯繫密切；筰都主要聚居在鹽源盆地及周鄰的寧蒗，與以老龍頭墓地為代表的鹽源青銅文化相關；嶲和昆明生活在今滇西地區。[220] 橫斷山區多個先秦遺址出土的粟、黍、稻、麥等作物遺存，說明當地自新石器時代以來就從事農業生產。[221] 該地區還擁有豐富的天然高山草場資源，畜牧業較發達，畜養羊、牛、馬等動物。岷江上游多座石棺墓中發現羊骨，[222] 當地養羊可能是橫斷山區人群

---

[218] 茂縣羌族博物館等，《茂縣牟托一號石棺墓》，頁 102-106。

[219]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 116，〈西南夷列傳〉，頁 2991。

[220] 段渝、劉弘，〈西南夷青銅文化及其文明的起源〉，《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 年 1 期：175-183。

[221] 鄧振華，〈金沙江流域農業的形成與早期發展〉，《中華文化論壇》2023 年 1 期：142-153。

[222] 四川省文管會、茂汶縣文化館，〈四川茂汶羌族自治縣石棺葬發掘報告〉，《文物資料叢刊》7（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頁 34-55；茂汶羌族自治縣文化館，〈四川茂汶別

吸收北方地區羊角或羊目狀雙圓餅首短劍、羊角形首短劍等因素的原因之一。牟托一號石棺墓出土器物上有牦牛的形象，[223]《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也記載冉駹「唯以麥為資，而宜畜牧。有旄牛，無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為毦。出名馬。有靈羊，可療毒。」[224] 鹽源老龍頭墓地出土較多馬骨和馬具，出土器物上也常見馬的形象。而與橫斷山區青銅文化聯繫密切的內蒙古中南部和寧夏南部地區，在約公元前 8 至前 3 世紀是遊牧的胡人的分布區，遼西、內蒙古東南部和冀北山地則聚居半農半牧的戎狄。[225] 橫斷山區與北方地區的早期文化交流，實證了早期遊牧、半遊牧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而地處橫斷山區中部的大渡河中游地區，海拔相對較低，水熱條件較好，更適宜農業生產，這是成都平原青銅文化向該地區強勢擴張的重要原因。

柒‧結語

橫斷山區與北方地區的早期文化交流，是先秦時期中國邊疆地區不同人群跨區域交往交流交融歷史的一個縮影，也是古代中國與歐亞草原文明互鑒和人文交流的重要例證。橫斷山區自新石器時代晚期以來，就與北方地區保持了密切的文化聯繫，至青銅時代晚期建立起由多條來自不同方向且具有明確時空指向性的交流線路構成的互動網絡，東、西方多元文化在橫斷山區碰撞和融合，造就了當地青銅文化複雜多樣、兼容並蓄、多元融合的特點。本研究不僅從考古學角度實證了橫斷山區與北方地區早期文化交流的史實，而且從關鍵因素的具體聯繫、交流機制、歷史背景等方面，豐富了兩地早期交流的細節，揭示了兩地早期交流的複雜性。

北方文化和人群的持續南下，是橫斷山區先秦文化起源、形成和發展的關鍵外在動力。自新石器時代晚期至青銅時代晚期，橫斷山區與北方地區文化交流的空間範圍逐漸擴大，交流機制漸趨複雜。新石器時代晚期，甘青地區農業人群的南下，推動了橫斷山區及其周邊地區的新石器化和農業化進程。青銅時代早期，

立、勒石村的石棺葬〉，《文物資料叢刊》9（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81-92；阿壩藏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理縣文化館，〈四川理縣佳山石棺葬發掘清理報告〉，《南方民族考古》第 1 輯（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87），頁 211-237。

[223] 茂縣羌族博物館等，《茂縣牟托一號石棺墓》，頁 25。

[224] 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 86，〈南蠻西南夷列傳〉，頁 2858。

[225] 楊建華等，《歐亞草原東部的金屬之路》，頁 358-402。

歐亞草原技術傳統經中國西北地區傳入橫斷山區，奠定了中國西南地區青銅時代的技術傳統和器用傳統。至青銅時代晚期，橫斷山區與北方地區的文化交流達到高峰，除甘青地區外，橫斷山區與新疆地區、河西走廊、長城沿線地帶、東北地區等中國北方廣大地區，以及歐亞草原中部的聯繫密切。隨著北方遊牧、半遊牧人群的遷徙和南下，以兵器、工具、馬具和葬馬習俗等為標誌的北方青銅文化傳播至橫斷山區，起源於歐亞草原中部的帶柄銅鏡、豎穴墓道洞室墓等文化因素，也經中國北方地區影響了橫斷山區。橫斷山區青銅時代晚期文化有選擇性地吸收了北方青銅文化的一些特徵，其中實用性較強、支持生活所需的兵器和工具在橫斷山區不同地區、不同社會階層的人群中接受度較高，葬馬習俗則為身分地位相對較高的少數人群所採納，反映出兩地在社會價值和身分認同上的共性特徵。儘管橫斷山區青銅時代晚期文化深受北方文化的影響，橫斷山區出土典型器物的器形與北方地區的同類器雖有相似，但幾乎無完全一樣者，橫斷山區對北方青銅文化的多元因素進行重組、融合和創新，並形成了本土特色。在兼容並蓄、多元融合基礎上的變異與創新，是橫斷山區青銅時代晚期文化形成與發展的內在動力。自然環境及其造成的生產生活方式和觀念體系的相似性，是橫斷山區與北方地區早期文化交流密切的基礎，而周鄰文化在橫斷山區的強弱態勢，是北方文化因素在橫斷山區空間分布不平衡的重要原因，其本質是畜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的拉鋸。橫斷山區與北方地區的早期文化交流，展現了橫斷山區因其通道位置而導致當地文化突出的融合性特徵，為研究先秦時期處於文化和政治中心區之外的邊緣地區，如何在大範圍、長距離的跨區域文化互動過程中，通過本土化的實踐逐步形成地域特徵，提供了重要案例。

（本文於民國一一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收稿；一一四年六月十九日通過刊登）

後記

本文在收集材料和寫作過程中得到了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周志清先生、田劍波先生、陳睿先生、王寧女士和重慶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葉小青女士的幫助，特此表示感謝。文稿的修改承蒙匿名審查人和編委會給予的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

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

二・近人論著

三宅俊彥

2002　〈關於初期曲柄短劍的用途〉，《邊疆考古研究》第 1 輯，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76-80。

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館

2011　〈雲南祥雲紅土坡 14 號墓清理簡報〉，《文物》2011 年 1 期：4-14。

大理州文物管理所、祥雲縣文化館

1983　〈雲南祥雲檢村石槨墓〉，《文物》1983 年 5 期：33-41。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甘肅工作隊

1980　〈甘肅永靖蓮花台辛店文化遺址〉，《考古》1980 年 4 期：296-310。

中國科學院中國自然地理編輯委員會

1982　《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北京：科學出版社。

內蒙古文物工作隊

1986　〈毛慶溝墓地〉，田廣金、郭素新主編，《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頁 227-315。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1989　〈涼城崞縣窯子墓地〉，《考古學報》1989 年 1 期：57-81。

2009a　〈內蒙古涼城縣小雙古城墓地發掘簡報〉，《考古》2009 年 3 期：15-27。

2009b　〈內蒙古涼城縣忻州窯子墓地發掘簡報〉，《考古》2009 年 3 期：28-48。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寧城縣遼中京博物館

2009　《小黑石溝——夏家店上層文化遺址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

內蒙古博物館、內蒙古文物工作隊

1977　〈內蒙古準格爾旗玉隆太的匈奴墓〉，《考古》1977 年 2 期：111-114。

水濤

2000　〈論甘青地區青銅時代文化和經濟形態轉變與環境變化的關係〉，《環境考古研究》第 2 輯，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65-71。

王仁湘

2008　〈西南地區史前陶器襯花工藝探討〉，《四川文物》2008 年 1 期：33-40。

包曙光

2014　〈中國北方地區夏至戰國時期的殉牲研究〉，長春：吉林大學文學院博士論文。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2007　《軍都山墓地——玉皇廟》，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0　《軍都山墓地——葫蘆溝與西梁垙》，北京：文物出版社。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九龍縣文化旅遊局

2011　〈九龍縣烏拉溪鄉石棺葬墓調查清理簡報〉，《四川文物》2011 年 1 期：25-3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日本九州大學、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旅遊局、爐霍縣文化旅遊局

2012　〈四川爐霍縣呷拉宗遺址發掘簡報〉，《四川文物》2012 年 3 期：15-28。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涼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館、鹽源縣文物管理所

2021　〈四川鹽源縣八家村西漢墓葬發掘簡報〉，《四川文物》2021 年 3 期：4-1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爐霍縣文物管理所

2014　〈四川爐霍縣斯木鄉瓦爾壁 M1 發掘簡報〉，《四川文物》2014 年 5 期：10-13。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館

1986　〈四川甘孜縣吉里龍古墓葬〉，《考古》1986 年 1 期：28-36。

四川省文管會、茂汶縣文化館

1983　〈四川茂汶羌族自治縣石棺葬發掘報告〉，《文物資料叢刊》7，北京：文物出版社，頁 34-55。

四川省文管會、雅安地區文化館、寶興縣文管所

1999　〈四川寶興漢塔山戰國土坑積石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99 年 3 期：337-366。

甘孜考古隊

1981　〈四川巴塘、雅江的石板墓〉，《考古》1981 年 3 期：213-218。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990 〈永昌三角城與蛤蟆墩沙井文化遺存〉，《考古學報》1990 年 2 期：205-237。

2001 《永昌西崗柴灣崗：沙井文化墓葬發掘報告》，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水縣博物館

2014 《清水劉坪》，北京：文物出版社。

甘肅省博物館文物隊

1977 〈甘肅靈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學報》1977 年 2 期：99-130。

田劍波、左志強、周志清

2018 〈試論金沙遺址出土早期銅戈〉，《江漢考古》2018 年 4 期：67-74。

田劍波、周志清、劉靈鶴、孫策

2023 〈四川鹽源老龍頭墓地〉，國家文物局主編，《2022 中國重要考古發現》，北京：文物出版社，頁 53-58。

田廣金

1976 〈桃紅巴拉的匈奴墓〉，《考古學報》1976 年 1 期：131-144。

田廣金、郭素新主編

1986 《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

石碩主編

2005 《藏彝走廊：歷史與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吐魯番地區文管所

1988 〈新疆鄯善縣蘇巴什古墓群的新發現〉，《考古》1988 年 6 期：502-506。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會理縣文物管理所、四川大學考古系、涼山州博物館

2010 〈2009 年度會理縣新發鄉考古調查簡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成都考古發現 2008》，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213-230。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涼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院、鹽源縣文物管理所

2025 〈四川鹽源縣老龍頭墓地 2020～2024 年的發掘〉，《考古》2025 年 11 期：58-77。

早期秦文化聯合考古隊、張家川回族自治縣博物館

2009 〈張家川馬家塬戰國墓地 2007～2008 年發掘簡報〉，《文物》2009 年 10 期：25-51。

江章華

2009　〈對鹽源盆地青銅文化的幾點認識〉，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成都考古研究・一》，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404-417。

西北大學文化遺產保護與考古學研究中心、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地區文物局

2014　〈2009 年新疆伊吾縣托背梁墓地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4 年 4 期：24-36。

西昌地區博物館

1978　〈西昌河西大石墓群〉，《考古》1978 年 2 期：91-96。

吳文祥、周揚、胡瑩

2009　〈甘青地區全新世環境變遷與新石器文化興衰〉，《中原文物》2009 年 4 期：31-37。

呂紅亮

2009　〈西藏帶柄銅鏡補論〉，《藏學學刊》第 5 輯，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頁 33-45。

呂學明

2008　〈中國北方地區出土的先秦時期銅刀研究〉，長春：吉林大學文學院博士論文。

2014　〈齒柄舌銅刀研究〉，《北方民族考古》第 1 輯，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59-74。

宋治民

1997　〈三叉格銅柄鐵劍及相關問題的探討〉，《考古》1997 年 12 期：50-58。

李逸友

1959　〈內蒙昭烏達盟出土的銅器調查〉，《考古》1959 年 6 期：276-277。

李萬濤

2020　〈論青藏高原東南麓新發現的石圍石棺墓〉，《西藏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 年 6 期：130-135。

杜戰偉、李奎

2019　〈禮州晚段遺存相關問題研究〉，《江漢考古》2019 年 4 期：61-69, 46。

周志清

2016a　〈中國西南早期青銅時代芻議〉，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成都考古研究・三》，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127-145。

2016b　〈淺析川西南青銅時代的管銎兵器——兼論川西高原在歐亞草原和北方文化傳播帶中的地位〉，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成都考古研究・三》，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146-158。

2021　〈橫斷山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的互動——兼論西南絲綢之路形成的史前基礎與文化交流〉，《中華文化論壇》2021 年 3 期：15-25。

固原博物館

1992　〈寧夏固原呂坪村發現一座東周墓〉，《考古》1992 年 5 期：469-470。

承德地區文物保護管理所、灤平縣文物保護管理所

1991　〈河北省灤平縣梨樹溝門墓群清理發掘簡報〉，《文物春秋》1991 年 2 期：15-30。

河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隊

1966　〈河北懷來北辛堡戰國墓〉，《考古》1966 年 5 期：231-242。

邵會秋

2005　〈先秦時期北方地區金屬馬銜研究〉，《邊疆考古研究》第 3 輯，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96-114。

2018　〈中國北方、新疆和歐亞草原文化的交往——以動物紋裝飾為視角〉，《西域研究》2018 年 2 期：43-56。

邵會秋、石嫦靜

2018　〈中國北方地區先秦時期馬鑣研究（一）〉，《草原文物》2018 年 2 期：35-53。

阿壩藏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理縣文化館

1987　〈四川理縣佳山石棺葬發掘清理報告〉，《南方民族考古》第 1 輯，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頁 211-237。

段渝

2010　〈藏彝走廊與絲綢之路〉，《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 年 2 期：1-5。

段渝、劉弘

2012　〈西南夷青銅文化及其文明的起源〉，《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 年 1 期：175-183。

茂汶羌族自治縣文化館

1985　〈四川茂汶別立、勒石村的石棺葬〉，《文物資料叢刊》9，北京：文物出版社，頁 81-92。

茂縣羌族博物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

2012　《茂縣牟托一號石棺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唐翔
1998 〈會理新近收藏的幾件青銅器〉，《四川文物》1998年2期：16-18。
宮本一夫
2002 〈東北亞地區觸角式銅劍的變遷〉，《邊疆考古研究》第 1 輯，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81-90。
2022 〈中國西南地區川藏高原、洱海系青銅器的變化〉，《南方民族考古》第 25 輯，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223-244。
徐佳佳
2017 〈成都平原中晚全新世典型遺址環境考古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地理與海洋科學學院博士論文。
格勒
1987 〈新龍谷日的石棺葬及其族屬問題〉，《四川文物》1987 年 3 期：11-15。
烏恩
1978 〈關於我國北方的青銅短劍〉，《考古》1978 年 5 期：324-333, 360。
1985 〈殷至周初的北方青銅器〉，《考古學報》1985年2期：135-156。
郝曉曉
2021 〈橫斷山區出土「雙圓餅首」與「T 形莖首」青銅短劍研究〉，《考古》2021 年 10 期：76-86。
張文立
2002 〈平山三汲出土銅鏡初識——兼論北方系鈕柄鏡〉，《邊疆考古研究》第 1 輯，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55-62。
張家口市文物事業管理所、宣化縣文化館
1987 〈河北宣化縣小白陽墓地發掘報告〉，《文物》1987 年 5 期：41-51。
張偉寧
2011 〈寧夏中衛出土的北方系青銅器〉，《考古與文物》2011 年 5 期：110。
張盟
2013 〈公元前 1 千紀的內陸亞洲山麓通道〉，長春：吉林大學文學院博士論文。
張增祺
1987 〈雲南青銅時代的「動物紋」牌飾及北方草原文化遺物〉，《考古》1987 年 9 期：808-820。

張錫瑛
1984　〈試論我國北方和東北地區的「觸角式」劍〉，《考古》1984 年 8 期：744-751, 768。
涼山彝族地區考古隊
1978　〈四川涼山喜德拉克公社大石墓〉，《考古》1978 年 2 期：97-103。
涼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9　《老龍頭墓地與鹽源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
涼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館、涼山彝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
2015　《一個考古學文化交匯區的發現——涼山考古四十年》，北京：科學出版社。
涼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館、普格縣文化館
1987　〈四川普格小興場大石墓群的調查與清理〉，《文物資料叢刊》10，北京：文物出版社，頁 155-158。
郭富
2013　〈四川地區早期帶柄銅鏡的初步研究〉，《四川文物》2013 年 6 期：33-45。
郭鳳武
1994　〈蘆山思延鄉戰國墓清理報告〉，《四川文物》1994 年 5 期：76-79。
陳亞軍
2020　〈河西走廊發現早期帶柄銅鏡研究〉，《敦煌學輯刊》2020 年 4 期：135-146。
陳葦
2012　《先秦時期的青藏高原東麓》，北京：科學出版社。
陳劍
2007　〈波西、營盤山及沙烏都——淺析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演變的階段性〉，《考古與文物》2007 年 5 期：65-70。
童恩正
1977　〈我國西南地區青銅劍的研究〉，《考古學報》1977 年 2 期：35-55。
1986　〈試論我國從東北至西南的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文物出版社編輯部編，《文物與考古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頁 17-43。
費孝通
1980　〈關於我國民族的識別問題〉，《中國社會科學》1980 年 1 期：147-162。

雲南省文物工作隊
1983 〈楚雄萬家壩古墓群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83 年 3 期：347-382。
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990 〈劍川鰲鳳山古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90 年 2 期：239-265。
2005 〈雲南昌寧墳嶺崗青銅時代墓地〉，《文物》2005 年 8 期：4-20, 70。
雲南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
1983a 〈雲南德欽縣納古石棺墓〉，《考古》1983 年 3 期：220-225。
1983b 〈雲南寧蒗縣大興鎮古墓葬〉，《考古》1983 年 3 期：226-232。
雲南省博物館保管部
1986 〈雲南永勝金官龍潭出土青銅器〉，《雲南文物》19：4-25。
黃銘崇
2015a 〈畜牧者與農耕者之間——早期鄂爾多斯文化群與商文明〉，李永迪主編，《「周邊」與「中心」：殷墟時期安陽及安陽以外地區的考古發現與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頁 23-98。
2015b 〈也談所謂「勺形器」以及早期鄂爾多斯文化群人們的「武裝化」與「移動化」問題〉，《古今論衡》27：77-100。
塔拉、梁京明
1980 〈呼魯斯太匈奴墓〉，《文物》1980 年 7 期：11-12。
楊妹
2022 〈新州博物館收藏的夏家店上層文化青銅器、石範及相關問題的分析〉，《赤峰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 年 5 期：8-13。
楊建華
2010 〈三叉式護手劍與中國西部文化交流的過程〉，《考古》2010 年 4 期：71-78。
楊建華、邵會秋、潘玲
2016 《歐亞草原東部的金屬之路：絲綢之路與匈奴聯盟的孕育過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楊寧國、祁悅章
1999 〈寧夏彭陽縣近年出土的北方系青銅器〉，《考古》1999年12期：28-37。

瑜瓊
1991　〈齒柄式銅刀芻議〉，《北方文物》1991 年 3 期：12-18。
葛全勝主編
2011　《中國歷朝氣候變化》，北京：科學出版社。
靳楓毅
1983　〈朝陽地區發現的劍柄端加重器及其相關遺物〉，《考古》1983 年 2 期：133-145。
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1995　〈寧夏彭堡于家莊墓地〉，《考古學報》1995 年 1 期：79-107。
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彭陽縣文物管理所
2016　《王大戶與九龍山——北方青銅文化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
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寧夏固原博物館
1993　〈寧夏固原楊郎青銅文化墓地〉，《考古學報》1993年1期：13-56。
趙志軍
2020a　〈新石器時代植物考古與農業起源研究〉，《中國農史》2020 年 3 期：3-13。
2020b　〈新石器時代植物考古與農業起源研究（續）〉，《中國農史》2020 年 4 期：3-9。
劉羽陽、王輝
2017　〈先秦時期西北遊牧地區動物埋葬習俗——從埋葬頭蹄的現象談起〉，《考古與文物》2017 年 1 期：62-69。
劉得禎、許俊臣
1988　〈甘肅慶陽春秋戰國墓葬的清理〉，《考古》1988年5期：413-424。
劉學堂
2017　《絲路天山地區青銅器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
鄧振華
2019　〈粟黍的起源與早期南傳〉，《中國社會科學報》2019.06.14，第 5 版。
2023　〈金沙江流域農業的形成與早期發展〉，《中華文化論壇》2023 年 1 期：142-153。
鄭紹宗
1984　〈中國北方青銅短劍的分期及形制研究〉，《文物》1984 年 2 期：37-49。
1991　〈略論中國北部長城地帶發現的動物紋青銅飾牌〉，《文物春秋》1991 年 4 期：1-32。

盧月珊
2022 〈中國北方地區先秦時期葬馬遺存研究〉，長春：吉林大學考古學院碩士論文。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989 〈遼寧凌源縣五道河子戰國墓發掘簡報〉，《文物》1989 年 2 期：52-61。

遼寧省昭烏達盟文物工作站、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東北工作隊
1973 〈寧城縣南山根的石槨墓〉，《考古學報》1973 年 2 期：27-39, 148-159。

霍巍
1994 〈西藏曲貢村石室墓出土的帶柄銅鏡及其相關問題初探〉，《考古》1994 年 7 期：650-661。
1997 〈再論西藏帶柄銅鏡的有關問題〉，《考古》1997 年 11 期：61-69。
2004 〈試論西藏及西南地區出土的雙圓餅形劍首青銅短劍〉，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編，《慶祝張忠培先生七十歲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437-447。
2005 〈論橫斷山區地帶先秦兩漢時期考古學文化的交流與互動〉，《藏學學刊》第 2 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頁 155-169。
2024 〈論西藏帶柄銅鏡的東、西兩系〉，《考古與文物》2024 年 4 期：63-71。

韓建業
2007 〈中國先秦洞室墓譜系初探〉，《中國歷史文物》2007 年 4 期：16-25。

瀋陽故宮博物館、瀋陽市文物管理辦公室
1975 〈瀋陽鄭家窪子的兩座青銅時代墓葬〉，《考古學報》1975 年 1 期：141-156。

羅二虎
2012 《文化與生態、社會、族群：川滇青藏民族走廊石棺葬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

羅丰、韓孔樂
1990 〈寧夏固原近年發現的北方系青銅器〉，《考古》1990 年 5 期：403-418。

寶興縣文化館
1982 〈四川寶興縣漢代石棺墓〉，《考古》1982 年 4 期：377-380。

蘇奎

2005　〈西南夷地區三種含北方系青銅文化因素短劍的研究〉，成都：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論文。

灤平縣博物館

1995　〈河北省灤平縣梨樹溝門山戎墓地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1995年5期：8-15。

東京國立博物館

1997　《大草原の騎馬民族——中國北方の青銅器》，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

An, Chengbang, Lingyu Tang, Loukas Barton, and Fahu Chen

2005　"Climate Change and Cultural Response Around 4000 cal yr B.P. in the Western Part of Chinese Loess Plateau." *Quaternary Research* 63: 347-352.

Anthony, David, and Nikolai Vinogradov

1995　"Birth of the Chariot." *Archaeology* 48.2: 36-41.

Benecke, Norbert, and Angela von den Driesch

2003　"Horse Exploitation in the Kazakh Steppes During the Eneolithic and Bronze Age." In *Prehistoric Steppe Adaptation and the Horse*, edited by Marsha Levine, Colin Renfrew, and Katie Boyle. Cambridge: 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pp. 69-82.

Brown, Dorcas, and David Anthony

1998　"Bit Wear, Horseback Riding and the Botai Site in Kazakstan."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5: 331-347.

Chen, Fahu, Guanghui Dong, Donglin Zhang, Xinyi Liu, Xin Jia, Chengbang An, Minmin Ma, Yaowen Xie, Loukas Barton, Xiaoyan Ren, Zhijun Zhao, Xiaohong Wu, and Martin K. Jones

2015　"Agriculture Facilitated Permanent Human Occupation of the Tibetan Plateau After 3600 B.P." *Science* 347.6219: 248-250.

D'Alpoim Guedes, Jade

2015　"Rethinking the Spread of Agriculture to the Tibetan Plateau." *The Holocene* 25.9: 1498-1510.

D'Alpoim Guedes, Jade, and Ethan E. Butler

2014　"Modeling Constraints on the Spread of Agriculture to Southwest China with Thermal Niche Models."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349: 29-41.

D'Alpoim Guedes, Jade, Hongliang Lu, Anke M. Hein, and Amanda H. Schmidt
2015 "Early Evidence for the Use of Wheat and Barley as Staple Crops on the Margins of the Tibetan Plateau." *PNAS* 112.18: 5625-5630.

Higham, Charles
2002 "Language and Farming Dispersals: Austroasiatic Language and Rice Cultivation." In *Examining the Farming/Language Dispersal Hypothesis*, edited by Peter Bellwood and Colin Renfrew. Cambridge: 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pp. 223-232.

Liu, Xinyi, Emma Lightfoot, Tamsin C. O'Connell, Hui Wang, Shuicheng Li, Liping Zhou, Yaowu Hu, Giedre Motuzaite-Matuzeviciute, and Martin K. Jones
2014 "From Necessity to Choice: Dietary Revolutions in West China in the Second Millennium BC." *World Archaeology* 46.5: 661-680.

Ma, Minmin, Guanghui Dong, Xin Jia, Hui Wang, Yifu Cui, and Fahu Chen
2016 "Dietary Shift After 3600 cal yr BP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Northwestern China: Evidence from Stable Isotopes."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145: 57-70.

Olsen, Sandra L.
2003 "The Exploitation of Horses at Botai, Kazakhstan." In *Prehistoric Steppe Adaptation and the Horse*, edited by Marsha Levine, Colin Renfrew, and Katie Boyle. Cambridge: 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pp. 83-104.

Wang, Juan
2018 *A Zooarchaeological Study of the Haimenkou Site, Yunnan Province, China.* Oxford: BAR Publishing.

Weiss, Harvey, and Raymond S. Bradley
2001 "What Drives Societal Collapse?" *Science* 291.5504: 609-610.

Xue, Yining, Rita Dal Martello, Ling Qin, Chris J. Stevens, Rui Min, and Dorian Q. Fuller
2022 "Post-Neolithic Broadening of Agriculture in Yunnan, China: Archaeobotanical Evidence from Haimenkou."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Asia* 30. https://doi.org/10.1016/j.ara.2022.100364.

Zhao, Yan, and Zicheng Yu
2012 "Vegetation Response to Holocene Climate Change in East Asian Monsoon-Margin Region." *Earth-Science Reviews* 113: 1-10.

三・網路資訊

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10 〈永勝堆子遺址〉，雲南考古 http://www.ynkgs.cn/view/ynkgPC/1/134/view/1280.html，2010.05.13。

寧夏固原博物館

http://www.nxgybwg.com/e/action/ShowInfo.php?classid=18&id=132。

郝曉曉

Archaeological Insights into Early Cultural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Hengduan Mountains and the Northern China-Eurasian Steppe Region

Xiaoxiao Hao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The Hengduan Mountains, located at the convergence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al transmission routes of the eastern Eurasian continent, serve as a significant corridor for cultural interactions and human migrations along the eastern Tibetan Plateau. During the pre-Qin period, this region had frequent interactions with northern China and the Eurasian Steppe, reflecting both the historical connections among ancient ethnic groups in China's frontier regions and the broader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ancient China and the steppe. The early cultural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Hengduan Mountains and northern regions reached their peak in the late Bronze Age. Compared to the late Neolithic and early Bronze Age, this period featured a wider spatial scope, richer content, and more complex mechanisms of cross-regional interactions. The present article focuses on weapons, tools, daily implements, horse gears, and horse bone interment, which were highly representative in the bronze cultures of both the Hengduan Mountains and northern regions, exploring the specific connections, mechanisms,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of the cultural interactions at the tim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interactions occurred through a complex network of multiple connections, each with a distinct temporal and spatial orientation. The Hengduan Mountains acted as a crossroads where diverse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collided and fused, contributing to the complexity, diversity, and inclusivity of the region's late Bronze Age cultures. The southward migration of northern cultures, along with nomadic and semi-nomadic groups, was a key external driver for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ate Bronze Age cultures in the Hengduan Mountains, while selective absorption, reorganization, and innovation of diverse cultural elements provided the internal impetus. The process highlights the remarkable integ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ocal cultures owing to the status of the Hengduan Mountains as a cultural corridor.

Keywords: Hengduan Mountains; northern China-Eurasian Steppe region; cultural integration; interactive network; pastoral culture